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5 年 11 月 30 日第 61 期（增刊）

本期目录

〔杜钧福文革研究专辑〕

阅史漫笔

- 杜钧福 对文革史的认识过程
- 杜钧福 文革梦魇隐于何处
- 杜钧福 谈“宜粗不宜细”
- 杜钧福 读一篇文革口述史访谈录
- 杜钧福 读李雪峰 1970 年在河北省的讲话

史林一叶

- 杜钧福 “双陈案”和造反派的功绩
- 杜钧福 天津文革中的三轮二社事件
- 杜钧福 彭湃一家文革悲剧的真相
- 杜钧福 文革中的高等学校搬迁

史实考订

- 杜钧福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回京后行止考
- 杜钧福 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
- 杜钧福 叶剑英冲谁拍桌子？
- 杜钧福 谁镇压了 1976 年的“四五”运动？

〔杜钧福文革研究专辑〕说明

多年来活跃于网络的民间文革研究者中，杜钧福是较有影响的一位。喜欢光顾他博客的读者不少，读他那些博文，总能了解到一些新的文革史实和新的观察角度，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并从他的分析、考订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作为一个年龄较大的网络作者，他的文章既有文革亲历者的现场感与真情实感，又有历史过来人的冷静、平和，同时，他还充分使用了网络资源，从而在研究中得到

了许多平时从书本上难以得到的信息。而更重要的是，在他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能让人读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杜钧福，196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入中国科学院为研究生。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退休后从事文革史研究。

本专辑特从杜钧福的博客中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这次发表前又经作者校订，有的略有修改补充。读过之后，若有兴趣，读者还可以到他的博客中去选读其他文章。虽说不上“字字珠玑”，但确是篇篇可读——特别是对于有心回顾或了解文革历史真相的人来说。

【阅史漫笔】

对文革史的认识过程

杜钧福

一

文革后对文革史的认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文革性质的论断是，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所说的反革命集团指的是林彪和“四人帮”集团。

这一论断，在当时是大体上顺应民意的。这从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的游行时的欢欣心情就可以看出。这是我亲见也亲身感受到的。

但是，回想起来，这“民意”实际上应区分为“官意”和“民意”两种。在当时，两者有许多共同点，没有人认真区分。

老百姓不喜欢甚至厌恶他们，特别是“四人帮”。“四人帮”鼓吹文化大革命，老百姓，至少部分老百姓，真的相信这革命很好，于百姓有利，所以跟着跑，但是革了十年，越革越糟糕，于百姓有利的事，一件没干，生活看不出任何改善的前景。这个江青，搞文艺革命，十年来，只搞出几个样板戏，电影只许看那几部，老百姓连台词都能背熟了。以前本来就很贫乏的各种书籍也都不许看了。凡能使生活五彩缤纷的任何有益活动都被禁止。老百姓当然把这个账算在江青身上。至于张春桥、姚文元两个，看来只会写文章，但他们发表的文章又臭又长，实在看不出说的是什么。老红卫兵原来很喜欢“江青阿姨”，后来很快翻了脸。造反派原来也喜欢这几个人，认为这几个人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文革中、后期，造反派被一个巴掌打了下去，却不见这几个人出来说话，也就生分了。

这是民意。至于官意，几乎所有老干部从一开始就都厌恶这几个人，只是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不愿得罪他们而已。但是真正想除掉他们的原因是一桩要害问题，就是“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走后门。这可真正得罪了干部集团。要知道，得罪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因为老百姓从来就是听吆喝的，没权。而得罪了干部集团可是致命的。这决定了“四人帮”注定要完蛋。

当然还有个林彪集团的问题。此处省略不说。

所以在那个时候，民意和官意有相通的地方，大家心情都很愉快。我总认为，那个时候，是中共整党的大好时机，能把自己整得好一些。但是这个机会失去了。这暂不说。

二

后来，对于文革历史的这个论断，人们渐渐看出问题。林彪、“四人帮”固然不好，但是在文革中，“四人帮”集团实际形成于文革后期，林彪集团形成于1967年“五一三”事件以后。在这两个集团形成以前，就发生了许多大事，如揪出彭罗陆杨，如各地揪“三家村”，“五十天”打反革命，如“红八月”屠杀、驱逐无辜市民，大串联带来的“天下大乱”……他们对这些坏事不能负很大责任。而他们以后干的坏事，也离不开伟大领袖。正如江青在法庭上说的：我是主席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所以，人们的思想就有些改变。还有一些人，对林彪、“四人帮”渐生同情之心，认为对他们处理不公。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毛泽东。这是反思文革历史的第二阶段。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

正确评价毛泽东，将其从神坛上请下来，恢复适当的历史位置，我是很同意这样做的。但是我对当前一些代表性的言论有些不同的看法。

这些评论，有代表性的有“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一说，还说“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的评价。前者据说是陈云说的。

这样用寥寥几句话评价一位领袖人物有其合理的一方面，它说明极端的两极语言可以加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但它也失之于简单化、脸谱化。所谓执政有错，而文革有罪，划分了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两个时期。文革是浩劫，不必说了。就是前十七年，历经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总共整的人也不在文革以下。特别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制造出旷古未有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难道不也是个浩劫吗？这是第一场浩劫，文革是第二场。这是我们关于当代历史问题看法的底线。不承认这个的人，我们不和他说话。

还有，既然建国以来两个时期相应两场浩劫，那么“建国有功”，这个功在什么地方呢？

近来，还有将毛泽东归入“四人帮”，变成“五人帮”的趋势。他们将文革描写为党内健康力量和“五人帮”的斗争历史，其思路和原来对文革的定性一致，只是将毛泽东移到“四人帮”里面。特别是，他们竭力渲染毛的品行的邪恶，将文革中的灾难描绘成毛的个人品质造成的后果。他们认为文革仍为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周恩来和“二月逆流”的老师们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毛泽东、“四人帮”和林彪是反动路线的代表。而拥护林彪的人则把林彪也放在正确路线里面。这种划分类似于文革中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理论，只是人员构成重新洗牌。

我认为，这样的历史观点有一定合理性。“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作的很多坏事，确实是毛泽东在支持他们。但是，将一切坏事归之于毛泽东，特别归之于他的邪恶品质，是完全不对头的。这种好人 vs 坏人的历史观，永远不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三

凡持有上述看法的人，都不是文革历史，特别是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只要充分掌握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就会发现事实绝对不是那样的。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虽有矛盾，但不能说是站在对立双方的。现在形成讨论热点的北京“红八月”屠杀，毛是纵容、支持的，而周可能是实际组织者。《记忆》57期所载的王锐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文章，揭露了这场迫害人数最多的运动主要是周发起的，而且在其后期，是毛发现杀人太多，而指示停止了。文革期间外文局有四起称为“政治谋杀案”的冤案，就是周恩来负责外事口时期制造出来，而在他去世后得以平反的。我这样说，当然也不是说周恩来是个“大奸似忠”的“坏人”，千万别再将他也扫进去，变成“六人帮”。我只是说，事情是很复杂的，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袖人物，有其理想主义的方面，否则也不会成为职业革命者。但其行事，只能根据具体利益考虑。所谓具体利益，主要考虑所依靠的干部阶层的诉求。例如走后门问题，他们明知不对，也只能屈从。为什么要屈从他们呢？因为整个国家结构就是这样。你要叫他们听你的话，维持这个政府的正常运转，你就必须给他们好处。毛泽东说这是个官僚阶级，但是他自己过着皇帝般的生活，不就是这个官僚阶级的总代表吗？他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是作为的结果恰如希腊神话中的力士想提起自己的鞋带将自己拉离地面，能成功吗？

我不反对否定毛泽东，但是要指出，现在竭力丑化、否定毛泽东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原来体制中人。什么体制？就是文革前的中国化了的斯大林体制。这个

体制，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否定了这个体制，他们就失魂落魄，命无定所。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这个体制？就是将一些大家都认同的“坏人”从这个体制中分割出去，恰如民进党中一些人想把陈水扁切割出去以维护民进党的名誉一样。他们先是将“四人帮”、林彪集团切割出去，后来看看不行，就想把毛也切割出去。

只否定毛，不反思体制，无法正确理解和评价文化大革命。

（2014年3月10日）

【阅史漫笔】

文革梦魇隐于何处

杜钧福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鲁迅《狂人日记》

林达的旧文《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对文革史的现状提出批评意见，说听不到文革受害主体“犹太人群体”，即“黑五类”的声音，也没人替他们说话。

虽然现实情况有所改变，一些网刊如《黑五类忆旧》、《往事微痕》都刊载了由这一群体成员（或其子女）的回忆文章，直接表达了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和诉求。还有一些书籍如杨显惠先生关于夹边沟事件的报道，也都极大地震动了一切有良知的读者的心灵，使他们深思这个社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我仍很同意林达的意见，因为相应的意识，即对这一群体所受苦难的漠视，仍深深存在于社会所有人的心目中，甚至无意识之中。追其原因，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我在《读〈陆平纪念文集〉》这篇文章里提到一件事：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陆平在1959年受康生的指使，攻击当时的校长、著名学者马寅初，将其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六年半后，也在康生指使下，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贴大字报攻击校长陆平，将其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革委会主任）。我看不出这两件事的实质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几乎所有有关论述中，都将康生指使这一点，作为替陆平辩护的理由，说批马不是陆平的本意。但是同时，将康生指使这一点，作为聂元梓邪恶本性的证明，说明她和康生就是一伙。至于康生如何指使聂元梓，

是事先谋划还是事后支持，北大的印红标先生还和北大另一些人极其认真地辩论了几个回合，就是因为都感觉这个问题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定性太重要了。

我无意替聂元梓辩护，我在文革里是支持反对她的北大“井冈山”一派的。聂元梓有她的问题，但关键的当然还是这个大字报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她一直被妖魔化。有人出了一本《乱世狂女》的书予以丑化，一位“国学大师”仍称她为“破鞋”，集体的无意识把一切脏水拨向这个可怜（但不是无辜）的女人，尽管她已服了十几年的刑，为她所作的坏事承担了后果。另一方面，陆平校长却生荣死哀，为舆论所称颂，北大还为他出版了专集予以歌颂。

我当然也无意丑化陆校长。我曾是他的学生。我也理解他当时批马寅初的处境。但是我为这两件事情的强烈对比所触动，深深地感到这个社会的不平等。不是文革前或文革中的不平等，而是目前的不平等。这不平等是看不见，抓不着的。长期以来，没有人触及这公开的秘密。

原因何在？就是大家都认为，陆平攻击马寅初，尽管马是著名学者，陆平也只能算是错误，也不能由他自己负责。而聂元梓攻击的是党的领导，尽管有康生，实际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也是极其邪恶的行为。在大众的意识中，根本不把马寅初这样的人当回事。群众仍然尊重强权，维护强权。

我还写过一篇网文，谈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问题。韩因在文革批斗会上殴打彭德怀被判了15年徒刑，但是在判刑时，他的另一问题未被提到，就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北航有11名被审查的教师自杀身亡，其中教师李国瑞一家五口集体自杀（见戴维堤回忆录）。作为当时北航运动的领导人，韩爱晶应负一定责任。我在那篇文章里说：“现在，韩爱晶被判刑了。但他迫害北航职工致11人自杀事件不算在内。从审判他的法官，到韩爱晶、戴维堤等原北航领导，到现今的历史学家，以及广大看众，大家无不感觉这样很自然。”

在现在的大众看来，这些教师依然命如草芥。

还有这么一位地方实权人物，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数他那个省抓得最多，在下放城镇居民运动中，他也最积极。他在权力所能达到范围内迫害群众和干部，反党乱军，除了忠于领袖之外，实在找不出什么优点。江青在文革里表扬过他，说他揭发了谭震林是叛徒，又立了新功。最近有人揭发他在文革里专门以告密为能事，陷害了其他许多高级干部。这样一个人直到现在还被捧得很高，专门出了书予以歌颂。为什么呢？

再举一例，众所周知，在1966年“红八月”里，有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被该校学生红卫兵打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基本上有个头绪，还有人拍摄了专题片。对该事件负有一定责任的宋彬彬等人也撰写了文章叙述该事

件。虽然很多人对她们的态度不满，但她们至少没表功。而在同一月里，随即在北京这个千年文明古都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抄家、刑讯、屠杀、驱逐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纳粹德国的“玻璃之夜”可与之相比。这件事的真相还远远没弄清楚，而且至今“杀人者们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这种反差来自何处？说穿了，还不是卞校长还有一定社会地位，而北京市在“红八月”里被虐杀的一千七百多人里，多数都是像王友琴所描写的左奶奶和马大娘那样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普通人？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例子呢？上述马寅初、北航的老师和左奶奶、马大娘都不是“黑五类”，不属于“犹太人群体”。但是如果这些处境显然优于“犹太人群体”的人尚且遭受这样的命运的话，真正的“犹太人群体”所遭受的苦难就可以想象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批判“三家村”的邓拓。有一个地方的一位地主分子绰号叫邓驼子，以为是批判他，惊吓死了。“工作队开会就说以后要注意，尽量不要死人，但死的是个地主，大家笑一下就算了。”（沈虹光《大洪山中》，载《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一个大活人死了，就像死一只蟑螂一样，一笑置之。

在“红八月”里，北京的“小业主”李文波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妻子被枪毙。事件的起因是红卫兵将他们夫妇拘禁在楼上，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李文波的妻子受不了，李文波去与红卫兵理论，遂酿成大祸。他们夫妇殉于爱情，是很高尚的。而他们被打死以后，报纸上还漫画丑化李文波的形象。

文革前，我在农村作为工作队员参加“四清”运动。我当时的体会是，对地富子女的歧视，与其说是一种政策，不如说是深深印在每一个人脑子里的一种意识。

我们刚进村不久，因为要腾地种麦，发动社员加班往地里送粪。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但是不久，一位贫农社员和一位地富子女发生了冲突。原因是该地主儿子推小车超过了岁数较大的贫农社员。该贫农社员不快，骂了一句。地主儿子还嘴，吵了起来，据说还动了手。当时我们的工作队长在场，将此事认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管青红皂白就训斥了该地主儿子一顿，说他不老实。

回来后，我们工作队员就议论此事。我认为，对该事的是非曲直的判断应基于调查，特别应听取社员们的意见，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令我诧异的是另几位工作队员的态度。

一位说：“对地富子女不能看他们表现，因为他们不得不劳动好。”第二位说：“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第三位说：“只许长工打地主，不许地主打长工。”均把

地富和地富子女同等看待。而且把地富子女任何进步的表现道路都堵住了。这几位工作队员，本身也未必出身很好，但是明显表现出不符合当时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的立场。

“四清”后期，华北局下来一项政策，要给表现好的地富子女改成份，将成份定为“农业劳动者”，待遇相当于中农。队里叫我做这件事。我们确定了一位地富子弟，那表现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了。但是我发现，广大贫下中农均不赞成这项政策。连中农也不赞成。

当时农村中本人是地富成份的已很少，他们的家庭中以解放后出生的青少年为主体。他们没享受过一天这个家庭昔日的富贵和荣光，却背负着偿还其“罪恶”的义务。他们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一般到高小至多初中为止），因为学校干部和老师明白党的阶级政策的字面意思（也许他们本身出身也不好），尚有好的感觉。可是毕业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劳动后，就入了另册，饱受歧视。我们进村搞“四清”的整个过程，从来是将地富子女和其他人分别召集开会，所以难怪社员普遍将他们视为异己。

所以我想，这个血统论的问题，似乎不仅仅是领导的问题。群众常常走得比领导还远。这样的极端的阶级路线和出身歧视政策，就某种意义来说，是适合了一些群众的需要。当时广大农民生活得非常艰难，可以说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亟需一个对立面，需要一些生活得更悲惨的人作参照物，以衬托他们的生活不是那样苦，还有活下去的理由。所以这个阶级斗争理论只是迎合人们的需要而已。这是说的农民，其实我们城里人也一样，也许程度和表现不同。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打了那么多各种分子，不全是领导的功劳。很多“反革命”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广大群众为了追求心理的平衡，在受别人歧视和欺负的同时，也很乐意身边有一些比自己矮一头的人或简直可以不当人的人供自己随便驱使和欺凌。

群众被强权绑架日久，患上了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候群，不但屈服于强权，而且对强权产生了崇拜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以强权对付更弱的群体。在1968年的湘南大屠杀中，直接下手虐杀四类分子的，不都是些衣不蔽体的穷苦农民么？

在今天，如果我们反思文革的时候，不能触及这样深层的问题，文革就会重来，也许形式不同。文革的梦魇就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之中。

我常常写一些论及文革的文章，有些被在网上转载。有些可能是年青的网友就说，什么年代了，还说那些事干什么？其实说文革就是说现在。

我坚信有那么一天，刻有1772名（也许更多）北京“红八月”受难者名字的石碑将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在这块石碑上面还镌刻着地藏菩萨的箴言：只要还有一颗卑微的灵魂在地狱里痛苦挣扎，我就不愿意升至天堂。那一天，就是中国

真正摆脱文革梦魇，可称为现代国家的一天。

(2011 年 1 月 14 日)

【阅史漫笔】

谈“宜粗不宜细”

杜钧福

“宜粗不宜细”似乎是邓小平提出的，指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不是研究历史的原则。但是即使是处理历史问题，有时候也不能“宜粗不宜细”。例如党史上著名的“草原密电”问题，涉及四方面军和主力红军的关系，也涉及对张国焘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不较真。对于个人的评价也是如此。

其实关键问题不在于粗细。“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粗不粗呢？虽然粗，但是事实。但是他后一句“蜀山兀，阿房出”就有些问题。根据近年考古发掘，阿房宫可能根本没建成。

作为“粗”的样板，我们再看看关于文革初期派工作组问题，官修史书是怎么说的。

工作组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它和后来的一些事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是这样说的：“采取派工作组领导运动这种传统的做法，目的显然是希望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试图消除许多基层单位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但是，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并且开展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工作组派到各单位之后，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两派斗争之外，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唆，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的困难地位。”

这里讲的话已经很啰嗦，言语含糊暧昧，把人绕糊涂了。我们再看看能不能找到叫人明白的话。

这是江苏金湖中学的《大事记》记载，取自网络：

“1966 年 6 月 19 日，金湖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揭阶级斗争盖子，原学校领导一律靠边。7 月 1 日召开批斗‘三反分子’原校党支部书记夏效忠大会，

并撤销其职务，接着，在教职员中大揪地主、国民党、叛徒特务以及三家村等‘黑帮分子’，把13人打成‘反革命’，对他们实行专政，边批判、边隔离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时期，学校里处处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1966年11月底，学校红卫兵选派代表上北京接受泽东检阅；部分师生组织起来进行大串联。他们先后于元旦前后回校，并相继组织各种战斗队，开始批判走资派和工作组，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当权派。至此，学校‘黑帮’解放。”

这段叙述言简意赅，将1966年6月到年底的运动情况全面概括，可以作为中学作文之范文，也可以作为最初一段文革史编写之范例。它极其具备代表性，现在全国许多中学校史或大事记上了网，内容都差不多，很容易查阅。

从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组进驻后，是试图消除、扭转混乱局面，还是制造混乱局面。而且，工作组制造的还不仅是混乱局面，而且是充满火药味的严酷悲惨甚至是血腥的局面。我们也可看到，“黑帮”是谁打的，被谁送去劳改的，又是被谁解放的。

从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学的校史和大事记的叙述可以领悟，在文革研究中经常谈到的北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进程，实属特例。不但在全国而且在北京市，绝大多数中学里没那么多高干子女，老师和学生都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在上述那些重点学校里，在1966年6月份，不管是造反还是保皇，都是一帮高干子女在那里折腾。别人谁敢？

我们很感谢全国各地中学里编纂校史或大事记的人们，他们将真实的历史展现给世人。现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在网上开博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博客也如实记载了那段历史。一些已出版的传记和回忆录也多少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随着历史大潮的退去，真相总会水落石出。

谈到传记，一般作者总是在拔高传主，因为他们不喜欢给坏人立传。所以对于所说的传主的那些光辉事迹，一般不太可信。但其余的细节，可能很有价值，因为作者不太在乎传主以外人的形象。例如在《王震传》（《王震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中谈到谭震林在文革初期到农垦部鼓动群众贴部长王震的大字报事，在别的地方不见记载。

当然，在读官修的历史的时候尤其要保持警惕，因为这里到处是陷阱。我们可以举《当代广东简史》（黄勋拔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为例。

在专讲文革中坏人坏事的一节中有一段“派性斗争和‘革命大联合’”，叙述到1967年初广东的形势。有一段说：“1967年2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后，全省又掀起一股揪‘广谭’（所谓广东的谭震林）的浪潮。如此类推，湛江揪‘湛谭’，汕头揪‘汕谭’。有的群众组织被挑动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借机开始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2月8日，广州

地区少数群众组织冲击广州军区机关。”

这段文字中，每一句叙述的都确有那么回事。但是按照这样的顺序编排起来，任何不了解真相的读者都认为事件的次序和因果关系就是这样。当然有常人智商的人会怀疑为什么2月的最初8天会发生这样多的事。实际上呢，所说的“二月逆流”主要指1967年2月16日的怀仁堂事件。而反击“二月逆流”是毛泽东在2月18日发出的号召，但在当时不为群众所知。直到3月初，北京市才出现群众性的反击“二月逆流”活动，提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这怎么能影响到2月8日在广东发生的事呢？

这就是“宜粗不宜细”的样板，在“粗”中将真相隐去，伪造历史。

我们当然要问，为什么要提倡“宜粗不宜细”呢？例如，这里发生了一桩案件，公安局来查。这时有人出来强调调查应“宜粗不宜细”，甚至干扰调查取证，那么公安局多半会确认他本人就是凶手。这是很自然的逻辑。

现在的问题正是这样。

据说广西大屠杀的主要凶手正在做着管我们全国某种重要事务的大官，甚至没人敢说出他的名字。我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发生在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用极其残忍的方法共杀死无辜人民近十万人。如实记录此事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已遭禁。目前在《人民网》上登载的官修全国《大事记》中在这一年仅记录了三件大事：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金缕玉衣，南京长江大桥建成，西藏建立革委会。

（2010年1月22日）

【阅史漫笔】

读一篇文革口述史访谈录

杜钧福

几年以前，《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发表了一篇千山暮《关于文革的一篇口述史访谈》，被访谈者或称当事人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个19岁的安徽芜湖高中生，是“黑五类”，因为父亲的右派分子身份。

文革“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一片惊惶，知道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和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整个的家庭，包括我本人，我们的亲属朋友，几乎都是陷于一种恐怖当中。”这是很多家庭的体验：极端的恐惧。

他父亲当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18号，我的父亲就和安徽省的一万

八千多名知识份子一起在同一个夜晚被逮捕了。第二天早晨，当我知道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来到学校里，那个时候我小学四年级。我们一个班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几乎有十多个同学的父亲或母亲被逮捕。”这种恐怖大概只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的反犹才能相比。

作者分析当年的统治手段：除了恐惧以外，“另外一种就是靠分化人民制造的，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当成统治阶级，当然是虚伪的，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说得很对。

作者进京串联返回时在北京火车站所见：“火车站的广场上面，全部是一片花头啊。男的，头发被剃光，女的，被剃成阴阳头，脸上冒血的，身上冒血的，到处都有，孩子被打得、吓得惊慌直叫的，满广场都是。红卫兵们，北京的高干子弟们，穿着军装，带着红袖标，手里拿着皮鞭，可以在他们身上任意地抽来抽去。后来知道，这一批人的总数有四千，干什么呢？把他们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改造。”我所见当时途经北京火车站的人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场景都很类似，没人见“西纠”在那里制止打人。而且，那些打人的高干子弟，应该就是西纠。

“有人认为有两个文革，一个共产党的文革，一个人民文革，我曾经在一个大会上问他们，你们当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态度是什么，对毛泽东天天搞阶级斗争的要求做了没有，如果做了，那么，你们的文革是不包括地富反坏右这些人民之外的分子的。如果有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是谁，发动者是谁，理论是什么？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如果把毛泽东发布 16 条以后的造反叫做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还是毛泽东。没有人能回答我。这是笑话么，人民有权发动一场文革的话，也就没有文革了。”我是持“两个文革”观点的，但是认为共产党文革和人民文革的称呼不准确。这个课题比较复杂，另文讨论，只说和地富反坏右的关系。

造反派和保守派对地富反坏右的态度有区别。造反派经常被攻击为和地富反坏右站在一起或者就是地富反坏右，而且经常被捆绑在一起遭到屠杀。造反派队伍不包含地富反坏右分子，但是包含一些“摘帽右派”和很多其他出身不好的人。周伦佐说在他们那里（西南）造反派主要是“黑五类”在起作用。文革中的右派翻案应包含在“人民文革”（我对这个词有保留）之中。很多右派拥护造反派，部分原因后面再说。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觉醒，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这是文革十年当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但是，人们也认为主要是坏人当道，被斗争打倒的人，刘少奇，朱老总，陈毅外交部长都是好人，其实这一批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了整，他们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但那是后来

了，当时对他们还没有觉醒，包括我本人。”这个分析很到位。但这位当事人不是文革研究者，知道的事不够全面。其实这几位领导人在文革中也是整人的，不比毛泽东更仁慈。

最后的总结：“海外，西方学界都认为文革是中共统治中最黑暗的岁月，我要承认的是，那种公开的，疯狂的，残酷的杀戮和迫害，是1949年以后最厉害的。但是，一个数字可以告诉我，在毛泽东统治的28年里面，前17年，文革前的17年，他杀害中国人民六千万。文化大革命，杀死，打伤是两千万。前17年里，凡是地富反坏右子女，都必须被强迫承认他们自己是反动的，整个思想，心灵，灵魂都是被扭曲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使这部分人获得了解脱和解放。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自己也倒了霉，他们百分之九十五都倒了霉。刘少奇都是反革命，那么，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些帽子的压力反而减轻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它有一个客观效果，表面上，它的轰轰烈烈的杀人镇压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它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从肉体到精神，远不如前十七年。而且，它扩大了‘反革命’的阵营，在全中国，把那么多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变成了反革命，因此，它使人民在心理上的承受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度过了1966年的那个残酷的夏天之后，我们的心情，比文革前17年，比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感觉反而还轻松了一点。为什么？举目一望，人人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许许多多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跟我住在同一个牛棚里，跟我一道受批斗，我胆子都比原来大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其实是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前身。它使（对）毛泽东的迷信破产了，它使对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跟文革前十七年相比，反而变轻了。所以1979年，邓小平为了收拾人心，进行平反的时候，你发现，平反的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57年反右，什么三反五反，59年反右倾，64年什么四清运动，主要是这些。海外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

这段说得很深刻，虽然一些词句过分了一些。它道出了很多类似右派分子这种传统“阶级敌人”当时的心境。我在前些年开博的第一篇文章《穿裤子的历史》也谈过这个问题。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

其实，当事人可以根据简单的逻辑再进一步，分析起这种客观作用的，并不是文革整体。他本人和家庭只在“红八月”间很压抑，后来就相对轻松了。反之，很多“黑五类”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进一步迫害甚至被杀害。所以，“反革命”在类别上“扩大化”因而引起阶级敌人队伍“稀释”的主要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某个时间段，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的造反运动。

(2015 年 2 月 15 日)

【阅史漫笔】

读李雪峰 1970 年在河北省的讲话

杜钧福

最近，我看到了一份文革期间首长讲话，是 1970 年 2 月 22 日在保定河北饭店传达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河北军区政委李雪峰关于中央三个文件的讲话精神内容（《极左的红色恐怖》，高雷鸟语博客，2014）。所说的三个文件应该是中共中央 1970 年 1 月 31 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 月 5 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这三个文件在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的新一轮政治运动，实际上是大规模的镇压。

但是，李雪峰在这个讲话中多次强调了抓“五一六”问题。在 1970 年开展的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第一次发出正式文件是中共中央 3 月 27 日发出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但是在这之前，许多地方即已开展了这一运动。所以李雪峰在这个讲话中，实际上是把这两个运动，即“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掺和在一起说的。在很多地方，这两个运动也没有分得很清。

我们在文革史的研究中，看到过很多中央首长讲话。李雪峰作为一省的领导，在布置这一个（或两个）政治运动时，所讲的内容重点，和中央首长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对如何开展运动布置得更加具体。这使得我们在研究时对于当时的领导开展运动的思路有更清晰的认识。

李雪峰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一个“杀”字。

运动伊始，要先杀一批。他说：“首长负责要向群众讲清，帝修反一来，这些反革命就是他们别动队，我们打击反革命，打击的就是苏修的别动队，这就把外批苏修，内批刘修结合起来，不要让群众感到是另一回事，这仍然是清队工作。先杀一批反革命，配合战备，各个单位都要发动群众搞。如果一个县杀三个，全省就四百多，但不要杀的太多，多数还是几个群众。一个县通过杀几个后，群众要讨论，一批又一批是一次又一次的群众大讨论，也是大宣传，家喻户晓。我们要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运动起来了，更应加强领导，打好这一仗。……”

过去我们总认为，一个运动开展后，先是揭发批判，揭发出来反革命，再把他们关起来或杀掉。现在看来，不是这样，杀人是运动的开始，不是运动的结果。

既然没开始揭发批判，那么杀谁呢？不用担心，现成的反革命总是有的，不管杀几个，都不冤枉，因为他们是“苏修的别动队”，跟苏修本人差不多。至于杀几个，不是根据他们的罪行，而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和领导给的指标。这里领导给的指标是每个县3个。

河北省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批杀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河南省军区副政委李忠顺在1970年3月份说，“一打三反”运动，全省第一批杀了249个。其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50个，地富子弟74个，新生的反革命（劳动人民家庭出身）132个（这3个数目加起来是256个，与前一数目不符，不知哪个有误，也许分类有重合）。这个数目跟李雪峰在河北省计算的相差不多。这说明，1970年在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可能都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当然，这是第一批，以后还有。李雪峰说：“组织专案班子，要处理一批。处理一批就是一个战役，有专人审查材料。班子要精干，发现问题马上去了解。各地区杀关管的班子很快成立起来，……”

一共几批，李雪峰没说。根据实际情况，在1970年一年内，各地均召集公审大会集体杀了几批。例如河北邯郸市和邯郸地区在3月15日杀5人，3月25日杀11人，4月24日杀31人，6月6日杀7人，合计杀54人。（《邯郸市大事记》，邯郸市档案信息网）

那么，“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国共杀害了多少人呢？据王年一从中央文件上看到的数据，1970年1月至11月底，全国共清理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人，逮捕28.48万人，判处死刑9千多人。（《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根据河北省和河南省的数据，这个数据平均每省大约300多人，也许比较可靠。但是很多地方的“一打三反”运动在1971年以后又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总的被害人数要更多。

那么，为什么李雪峰讲话的中心是一个“杀”字呢？为什么运动伊始，就计划要杀那么多人呢？

这万余人被杀，不是他们有什么“罪”，而是开展运动的需要。

他说：“杀人，中间派就向左边靠了。对四类分子、劳改犯也是一样，要在他们中间，要把5·16孤立起来。……”

李雪峰这样的干部，根据他们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知道要把这项中央布置的运动雷厉风行地贯彻下去，不至于走过场，杀人是关键。

不杀人无以立威，不杀人不能使人恐惧，人们不恐惧就不听你的，就抓不出反革命来。

所以，每个县先杀的那3个人，是否该杀，为什么原来他们罪不至死，但运动来了就先拿他们祭旗，他们的死，对他们本人、他们的亲人意味着什么，根本

不是李雪峰们思考的问题。

现在，一些人在讨论政治运动中杀人或者说打死人问题，讨论究竟谁该为此负责。可以说，杀人不是运动领导者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动员的手段。在一些运动（如土改）里，群众是否打死地主也是群众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标杆。没达到这个程度，就不算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一点可能也适用于文革中的“红八月”。

在强大的杀人机器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淫威下，普通人命如草芥，如同蝼蚁一样遭到践踏。

对于这样的死亡事件，有谁来道歉呢？

（2014 年 7 月 14 日）

【史林一叶】

“双陈案”和造反派的功绩

杜钧福

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建国初期广东“双陈案”，是这样说的：

“广东‘双陈’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广东的造反派揭发出 1951 年的广东公安部门的‘双陈’案问题。‘双陈’指原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和另一副局长陈坤，当年说他们包庇‘国际间谍’梁侠（实为驻香港特情人员）。1951 年 1 月，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宣布逮捕陈泊。同时陈坤也被捕。又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 300 多人，广东省公安厅系统则逮捕 700 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 1952 年 10 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 8 年徒刑。当年审判‘双陈’案的公安部人员也因认为不存在特务集团而被错误处理，赶出公安队伍。（《撩开案情厚重帷幕，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文史精华》，2005 年第 5 期）此案称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直到 1982 年才平反。文革初期打倒了罗瑞卿，广东的造反派在 1968 年 1 月重提此案，还成立了“双陈”专案组。他们提出：“我们要通过对‘双陈案件’的调查，揪出罗瑞卿的黑爪牙，为无辜受害的干部和因坚持正确路线而被迫害的革命干部彻底平反。”此案在文革中没有结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方面》，《共识网》，2011）

陈泊被判处 10 年徒刑，服刑到期后也未被释放，一直在劳改农场里劳动，

于 1968 年去世。我原来以为，他到死也不知道造反派为他鸣冤叫屈的事。现在才知不是这样。

2014 年第 5 期《炎黄春秋》上有一篇《“红色福尔摩斯”布鲁的遭遇》，说的就是陈泊即布鲁的事情。作者吕璜是布鲁的妻子，“双陈案”后也被开除党籍，而且不许她去探视正在服刑的丈夫。

夫妻十几年未能见面，直到文革中的 1967 年。“1967 年 8 月的一个晚上 10 点多，突然有人敲我的小院门，我开门听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及顺德说：‘布鲁在门口等你。’这突然的情景，令我又惊又喜，14 年了，今天终于重逢相见，那感觉真是如梦如幻。”他们这一对患难夫妇在王府井一带遛了三个钟头，“及顺德在远处监护着”。晚上 11 点终于离别，及顺德用自行车把布鲁带回北工大。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布鲁在北工大学生的帮助下进行申诉，得空时，我陪他到医院检查治疗他患的严重胃病。那时，他平时住在北工大，有时也住我的宿舍。这就被妇联造反派所不容，于是他们便和公安部的造反派一起，在布鲁来我宿舍的大街上将他绑架，由公安部武装押回湖北沙洋劳改农场。”

为陈泊翻案的事从此结束。

布鲁在 1967 年 8 月第一次与其妻见面时，其妻吕璜听见叫门时就知道是北工大学生及顺德，可见她与及顺德不是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及顺德肯定与她商谈过布鲁的案情。

我以前只知道广东造反派在文革中为布鲁翻案而奔走，不知道北工大学生也涉及此事，而且将布鲁接到北京居住，予以保护，帮助他向有关部门申诉。

那么，这个及顺德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能在文革那样险恶环境下奋不顾身为中共历史上的冤案的洗雪奔走呢？他是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 61 级学生。他的中学同学叙述过他的经历：“在与老及的交谈中，方知他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幸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隐蔽战线被誉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原延安保安处侦查科长、时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布鲁（陈泊）同志（三十集谍战悬疑电视剧‘红色利剑’主角鲁平的原型，2001 年习仲勋同志亲笔为布鲁题‘红色福尔摩斯’）接触，并担任了‘北工大两陈专案组’组长，为保护布鲁同志，为‘两陈案件’的平反昭雪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正因此，1971 年及顺德被整，公安部下文，他在甘肃天水干喷漆工劳教八年，1979 年才恢复工作。1981 年中央给‘两陈案件’正式平反，公安部给长城开关厂重新下公文，对及顺德因‘两陈案件’所受株连给予平反。（新浪博客《北京 31 中 61 届高三四班校友》，《来今雨轩 一杯清茶——见到及顺德》，2014）

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被清华录取，而得益于当时北京市委执行后来被批判的“阶级政策”而上了北工大。“可是，那些年‘左’

的影响，要不是刘仁市长特批，建校一年的北工大录取了 43 名全市‘政审不合格’的高考尖子生，恐怕他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同上）由此可见彭真、刘仁这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他们在文革开始后很快被打倒，这也应是一个原因吧。

及顺德介入此事，还有两个特殊原因。第一，“布鲁（陈泊）延安出生的孩子陈修力（卢山）与及顺德是北工大机械系 61 级同学。”（同上）布鲁的这个孩子，可能也属于政审不合格者之一。

第二，大家知道，北工大在文革中出了个著名人物谭力夫。在 1966 年 10 月以后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他由于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宣扬血统论的讲话被批判。而谭力夫是前总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而这个当时已经去世的谭政文正是制造“两陈”冤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负责人是罗瑞卿。要不是当时罗瑞卿被打倒，也不会有为“两陈案”翻案之举。谭力夫被批判，自然牵涉到他的老子，也牵涉到“两陈案”。

这就是北工大涉入“两陈案”的具体背景。但是总的政治背景离不开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在《炎黄春秋》上的吕璜文章中谈到，是“在北工大学生的帮助下进行申诉”，而及顺德的身份也是北工大学生。另一方面，是妇联和公安部的造反派把获得自由几个月的布鲁绑架送回了劳改农场。这篇文章当然也会激起对造反派的仇恨。

熟悉文革历史的读者不会相信这样的描述。在文革大潮中，没有人仅以学生名义干这样的事。干这样的事的必然是群众组织，而在 1967 年夏，基本上只有造反派组织存在。再者，从整个文革历史看，只有造反派能够为中共历史上受冤屈的人申冤。

当时北工大掌权的“东方红公社”是首都三司的组织。这个组织，由于是从批判谭力夫血统论起家的，属于比较典型的造反派组织，比起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坏事干得少。“当清华大学等校热火朝天地围困中南海批斗王光美时，该组织却将精力用于追踪谭力夫的后台，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康生’的大标语；追查谭力夫父亲历史的极左行为——为建国后党内第一起冤案‘二陈事件’翻案；介入北京中学生的运动，支持以‘出身不好’为主体的中学‘四三’派，在全国肃清谭力夫讲话的流毒下功夫。”（马士田《文革中被乌云笼罩的高校里的一道闪电》，“爱思想”网站，2012）

所以为“双陈案”翻案，是北工大造反派“东方红公社”在当时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绝非及顺德个人行为。但是在《炎黄春秋》的文章中绝口不提这个实质问题，反而强调是妇联和公安部的造反派将布鲁绑架，从而逆转局势。

妇联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公安部的造反派”是什么概念，实在有些费解。

文革开始后，“主席在拿下彭罗，改组彭真刘仁原北京市委的同时，迅速整

肃北京市公安局以防政变；毛从全国选调一千四百名军官，夺掌大权。军任职市局领导；师任职各区县局领导；团职营级到处科；连职干部分配派出所。”而原来的干警：“北京市公安干警 1693 人遭残酷打击迫害，72 人关押成囚犯。”后来又进一步改造公安系统：“1966 年、1967 年，从军队选调兵团级一人，军级三人（内从空军×军副军长到公安部的赵××，1971 年九·一三后被拘捕审查），师级十人、团级二十人，进公安部大‘掺沙子’，军级干部为部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67 年 12 月 9 日，中央又发〔67〕379 号文件，再次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凡未实行军管的应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毛德传《公安系统的文革浩劫》，《共识网》，2012）

所以，公安系统的文革完全不同于地方单位，实际上是军队干部进驻夺权。原来的干警绝对不敢造反，新来的部队干部也不会造反，也从未听说过公安部有什么造反派，更没听说公安部由造反派掌权。文革后公安部有几位领导干部被指责为犯错误甚至被判刑，但也没说他们是造反派。

如果妇联当时确实是造反派掌权，他们将此情况告知公安部。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从 1967 年 8 月起，布鲁的申诉活动持续了几个月。我估计这就已经到了 1968 年中了。1968 年是什么形势？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陆续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又回到了文革开始时候的政治高压形势，一切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理的人又开始倒霉。由于自己的队伍不纯，造反派也跟着开始倒霉，直到夏末秋初工宣队进驻彻底倒霉。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没人把布鲁绑架送回劳改农场，北工大的造反派能否继续这样的翻案活动，也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所以，即使当时妇联不管什么人掌权，在他们宿舍里住着这样一位来历不明的人，自然会提高警惕，告诉公安部。

不过，就算妇联的造反派干了坏事，比起北工大造反派用几个月时间给布鲁翻案，造反派的功劳还是大。在这段时间里，失去自由十几年的布鲁终于和妻子团聚，也认识到人间终归有正义存在，也就是有希望存在，尽管所有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去世时也多少有一些安慰了。

我为什么强调造反派的功绩呢？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说造反派的坏话。就拿《炎黄春秋》这篇文章来说，本来是造反派在给布鲁翻案，偏偏只说是当时的北工大“学生”，反而强调莫须有的“公安部造反派”绑架布鲁。

但是我不愿指责这篇文章作者吕璜。她已是一位老人，文章应是别人代笔写的或修改的，也许是《炎黄春秋》的编辑按习惯思维（文革中的罪恶，上边归林彪、“四人帮”，下边归造反派）改的。

《炎黄春秋》这一类做法由来已久。再举 2011 年第 8 期《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是魏海林的《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说的是文革中的 1967 年，江西萍乡的上栗中学红卫兵帮助原萍乡报社 1957 年被打为右派的记者何式和其他几个右派翻反右运动的案，成立了调查组。到 1968 年元旦，又有 23 个群众组织参加，称为“萍乡报社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组”，并自行召开大会，宣布给何式等人平反。他们还将右派分子肖琦写的《怒揭 1957 年反右斗争中的刘邓黑线》文章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万山红遍》第 3 期上，向全国发行，受到各地右派分子的拥护，引起很大震动。

1968 年 2 月底，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向中央文革汇报此事。江青说右派翻案要严惩。3 月 2 日，江西省革委会指示公安局采取行动。3 日，“在萍乡市公安局军管会领导的授意下，以萍乡工人造反组织‘大联筹’为主的上百名手持棍棒的造反派突然冲进《万山红遍》编辑部……”，进行逮捕和封存。然后是开大会批斗：“造反派先一一列举何式的罪状，然后一顿乱打，打得他当场晕死，又用凉水喷醒……”都把造反派描绘成一伙罪恶滔天的暴徒。

可是，给这批右派翻案的“红卫兵”是哪批红卫兵呢？参加调查团、宣布给右派平反的“群众组织”又是哪些群众组织呢？文章却很含糊，未予交代。

从 1967 年到 1968 年，萍乡的文革形势大致是，1967 年 7 月 13 日，萍乡保守派组织进攻并火烧了萍乡煤校，“自‘7·13’火烧煤校，震惊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怒斥保守派后，萍乡支持造反派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央派来了解放军支左，煤校学生开始陆续返校，学生造反派的势力又凝聚起来了，全校师生员工在萍乡城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局势对造反派还是不利，因为保守派掌握了武装，手中有枪，驻扎在萍乡饭店内，控制了萍乡城最繁华的路段，造反派仍然受到威胁。后来萍乡造反派从支左部队手中拿到了武器，经过不到一天的枪战，保守派退往山区，后来造反派乘胜前进才将保守派武装彻底瓦解，萍乡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了武斗，又恢复了正常。”这次武斗发生在 1967 年 8 月 8 日到 9 日，称“八八、八九”事件。（杨明远《回顾文革经历引发的思考》，红歌会网，2014）

所以，在 1967 年 8 月以后，萍乡是造反派的天下，而且得到了驻军的支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给右派翻案的事。《炎黄春秋》上魏海林文章中说的红卫兵，几乎可以肯定是造反派红卫兵，群众组织就是大联筹。但此文只字不提造反派给右派翻案的功劳，只提后来在军管会授意下，迫害这批人的行为。这就使读者误认为，造反派自始至终反对给右派翻案。1968 年 3 月以后，是军管会和造反派合伙迫害这些给右派翻案的人。

实际上，尽管有些造反派遵从军管会命令，参与迫害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好

日子也到了头。从 1968 年 3 月起，江西在程世清指挥下，开展了“三查”运动，声势比全国其他地方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声势要大得多。造反派不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尽管造反派中有不少人也反对给右派平反，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一直和右派相始终。

我并非专门挑《炎黄春秋》的毛病，只因为我订阅了这个杂志，看得仔细一些。况且这个杂志一向以尊重历史真相为号召，我希望它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对那些完全不尊重历史的杂志，我是不屑一顾的。

我所说的造反派被诬蔑现象几乎每天看到，如《共识网》登载关于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在文革中惨遭毒手的事情，标题是他被造反派殴打致死，完全是颠倒黑白。实际上，姚桐斌本人就是造反派，被七机部保守派九一五殴打致死。

再拿刚引过的毛德传的文章来说。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是其中有这么一段：“宪法成废纸，人权、法制与民主荡然。砸烂公检法再加上号召‘群众专政’、‘造反派说了算’，一度各地随意抓捕乱杀成风，湖南省的零陵专区，在 1967 年 7、8、9 三个月就屠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子女，共杀死和被迫自杀达 9323 人。其中，四类分子的子女 4057 人；尚未成年者 862 人。还有四类分子及子女受毒刑致伤残 2146 人。手段极端残忍，人性泯尽，连观世音大士和主耶稣基督也无踪影。近万冤鬼悲啼，老百姓不敢夜行，新中国人世间竟有此恐怖岁月！”这段其他说得都对，只是“造反派说了算”不知出自何处。另外，说零陵地区的惨案时没有主语。如果连贯看，似乎是造反派在那里杀人。事实是当地以武装部为核心的基层政权和保守派以屠杀四类分子震慑造反派的行为，也有部分造反派被杀。

从这角度看，抹黑造反派，歪曲历史真相的流毒，使许多认真严肃的文章都受到了污染。

(2014 年 5 月 23 日)

【史林一叶】

天津文革中的三轮二社事件

杜钧福

1966 年 8 月底 9 月初，天津发生三轮二社事件。官方编纂的大事记中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8 月 29 日天津市三轮运输二社召开职工代表会，筹备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会议进行时，部分工人一哄而上，将支部书记陈良谋及社主任、人保股长、工会主席等 47 人非法抓捕关押，接管了该社文件、档案及印

章，并对被关押人员酷刑拷问。支部书记陈良谋 9 月 1 日被害。此事激起公愤，先后有 2400 多个单位、49 万多人次到三轮二社追悼陈良谋。是为轰动全市的‘三轮二社事件’。”（天津地方志网）

读到此，每一有正义感的人士都会义愤填膺，痛斥那些不法分子的滔天罪行。大事记所描述的事件也对官方口径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最恰当的诠释，就是一场别有用心的人的打砸抢反党事件。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看了这段叙述也许会这样想。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这里的事没那么简单。

1966 年 8 月底 9 月初是什么日子？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幅什么情景？

这个时期，在北京叫做“红八月”。所谓红，并不是指红旗的红，也不是指红卫兵的红，而是鲜血淋漓的红。几千名受难者的血染红了 this 1966 年 8 月。

具体说，在北京，是从 8 月下旬到 9 月初的十来天里，在市区和近郊区一共打死了 1772 人。远郊区的死难人数至今没有统计，肯定在千人以上。他们不是简单被打死的，而是备受酷刑，如挨皮鞭抽，被开水浇，受尽折磨后悲惨地死去的。至今我们没有这样一些受难者的名单。他们的灵魂无法得到超度，至今还在这个该诅咒的城市上空徘徊，也成为一些该对此负责任的人永久的噩梦，每夜无法安静睡眠。

这场灾难像瘟疫一样飞快传播。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天津最先响应。上述大事记说：“8 月 24 日，随着‘破四旧’的活动，抄家之风在本市开始泛滥。从 25 日到 9 月 12 日形成高潮。抄家过程中，出现了批斗、打人、挂牌子和戴高帽子游街的动乱场面，有些地方还出现打死人的惨状。”

最后一句话说得未免过于矫情。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能交待了天津的“红八月”吗？

所有老一辈天津人都看到而且永不忘记的是，在这几天里，时时可见自杀和被杀人员的尸首在流经天津的海河上漂流：“1966 年 8、9 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死永不分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赵淮青《文革北大有多少教授学者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杀》，人民网，2012）

天津“红八月”中的这些死难者是些什么人呢？和北京一样，他们中绝大多数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

天津名校耀华中学的教师范景斌，就因为丈夫是曹锟后裔，“在抄家狂潮中，

她家附近的中学红卫兵打上门来‘索命’，当着十来岁小儿子的面，把家中四口中老年妇女（包括一名老保姆）全部狂殴至死。”丈夫被关押在单位得以保全。

“天津市工商联全体成员惶惶不可终日，在单位里‘学习’待命，一群红卫兵如凶神恶煞，冲进去狂殴。主任委员王光英身躯健硕，还能扛得住。副主任孙冰如是天津‘面粉大王’，解放前夕曾以数千袋面粉资助地下党，成功策动伪警察反正。孙当时已经七旬，被逼头顶肩负沉重的靠背椅，再加拳打脚踢，终于不支倒地毙命。秘书长车重远……是一个小心翼翼、谨慎谦逊的非党干部，被枪托捣中心口，当场猝死。”（陈中平《穿越历史的急流险滩》，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

“这时挨斗的对象恐怕最多还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包括一些刚露苗头的造反派。当权派还是少数。”（陈风雨《青春记忆》，风雨男人博客，2005）

三轮二社党支部书记陈良谋就是这少数当权派中的一个。

对于三轮二社事件的前因后果，上述大事记说得非常模糊，正是所谓“宜粗不宜细”的样板。事情的真相，据说也有人前去探究，但当事人均三缄其口，调查者无功而返。

当时天津市文联的作家王林在9月11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到红楼（原佟楼）一带转了转，看墙上的大字报。参加毒打三轮二社党书记陈良谋的中学生也有大字报，推卸责任，说陈是被马医生（冲出重围出来呼吁惨案者）打毒针伤命的。另有三轮工人（当事人）批驳。公安局对陈尸也做了化验，不是中药毒致命的。看来中学生被骗，是三轮二社中的坏分子，造谣说陈书记是汪精卫的汉奸，有七条人命等。”（电子刊物《记忆》39期，2009）

这说明两点。一是有中学红卫兵参与毒打。这不奇怪，因为无论北京还是天津，中学红卫兵均是所有血案的主要制造者。在此案中，红卫兵很可能是主要施暴者，因为在事后的有关传单中，明确说责任者是三轮二社红卫兵。这三轮二社红卫兵是由“卫国道中学红卫兵和我社的部分青年”组成，中学红卫兵还放在前头。

第二是陈良谋被指控为“汪精卫的汉奸，有七条人命”，正是“红八月”里要惩治的“牛鬼蛇神”。至于调查落实，红卫兵可没那份功夫和涵养。

汪精卫的汉奸（另一说是国民党）也许有点说头，七条人命几乎肯定是造谣。至于为什么给他造这个谣，应该有什么过节。这不是红卫兵的问题。

这年9月22日，有一张署名天津市东风区（即和平区）三轮二社事件红卫兵主席团的铅印传单《谁是三轮二社反革命案件的罪魁祸首？！》。里面揭发批判这些施暴的人“公开反抗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这背后是什么？只能根据一般规律猜测。在文革初期，工人造反者，特别是

非产业工人，容易提出经济方面的诉求，当今很多研究者对此很肯定。19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曾实行计件工资制，使一些勤快的工人收入不菲。到了1964年，特别是开展“四清”运动以后，计件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一般都被取消，使平均工资水平降低，严重影响了工人收入。在一些工厂里，这往往成为文革期间造反的动因之一。天津三轮二社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否就是这样的问题，可待研究。

在知情人李建华的“蔚蓝的海”博客中，有一篇《张大爷和张爷爷在文革时的遭遇》（2013），提到三轮二社事件：“据说，陈良谋由于阻止一些‘有问题’的人成立造反组织，那些人对陈良谋进行‘阶级报复’，将陈良谋打死那些人有在文革初期受触及的人。陈良谋做为党的基层干部按照党的政策整了那些人，那些人在伟大舵手调整斗争方向之后，所以就要造陈良谋的反，所以陈良谋就成了文革的牺牲品。”

毋庸过多解释，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根据经验已经大致看出事情发展的脉络了。这就是文革初期的“刘邓路线”，或毛泽东抨击的“五十天法西斯专政”。至今还有很多研究者美化这段时期，把它说成是“反文革”的。这种看法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刘邓主持文革的时期难道不是文革的一部分吗？

这是一桩以暴易暴的典型事件。在三轮车工人这样的群体中，类似事件并不鲜见。

北京市掏粪工人时传祥由于曾被刘少奇接见，在文革中备受摧残去世，在文革后受到崇敬，家乡建有他的纪念馆。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在他遭受迫害之前的故事。

在文革初期，时传祥不满他的徒弟给党支部贴大字报，亲自指挥对这名徒弟的殴打。这位被殴打者回忆：“他们的棍子打断了好几根。时传祥在一旁说：‘你们不好好交待，打死了算白打。’……一直打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倒在血泊中昏死了过去。”时传祥以为他死了，送到公安局。公安局把他扔到死人堆里，等到火葬场来拉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逃了一命。（《红色造反报》，1967年1月12日，转引自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

可以判断这就是文革初期“五十天”内的事情。当时我们这些造反的年轻人同样受到迫害。但是这两种迫害看来有多么不同啊！我们不过是在十几天里被迫参加了几个“辩论会”实则批判会，行动自由也没受到限制。

所以，尽管细节还有待弄清，这个三轮二社事件的大致轮廓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但是三轮二社事件的诡异之处在于，它正好处于两种潮流的交汇处，因而

在文革史中有某种标杆的作用。

两种潮流，一是早期红卫兵运动，针对的是社会上意义含糊的“牛鬼蛇神”，执行者主要是中学血统论红卫兵，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横行乡里、所向披靡。另一潮流是文革初期的造反，以及“五十天”内的镇压，毛泽东返京后，又翻了过来。一般来说，这两种潮流在当时很少有交集，因为红卫兵主要在街上耀武扬威，而造反派的造反活动一般局限在单位内部。而且，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造反派还未成气候。

在北京，这两种潮流的交集是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到上级领导机关要求原工作组成员回校检讨时，“西纠”派队伍前去阻扰和挑衅。由于造反派的克制态度，这两事件均未造成严重后果。

而天津的三轮二社事件表明，文革中天津的工人运动更早走到前面，也预示着工人在以后的造反运动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和最后导致的悲剧结果。

我们再看天津工人运动另一例。在汽车运输七场，保养车间的工人陈风雨、姜玉江于6月初贴大字报揭发领导问题，遭到领导组织的大字报围攻，但未受到进一步迫害。8月“十六条”颁布后，有学生来厂支持他们，反对领导的工人派人到北京上访后，于22日再次贴出针对领导的大字报，并于24日封了场里的广播站，成立了临时文革小组。这天晚上因交通局各公司领导来场，造反派工人找他们解决问题，临时召集了有串联学生参加的会议。会上领导们同意造反派关于干部罢免的要求和明日召集大会。25日举行全场大会，辩论中双方激烈交锋，最后造反派取得胜利，两名不得人心的干部被揪出，市委干部代表市委肯定这次大会。此后造反派实际上已经夺得场的党总支部的权。

在这几天里，工人造反派始终得到周围学生特别是河北大学“八一八”的支持。但是，他们夺权后，在如何对待被揪出的干部问题上和部分来支援的学生发生分歧。其中七中的学生是官方组织的干部子女“主义红卫兵”，他们“要求我们立即召开批斗会，并大声得意地宣扬他们如何打人。这些人一水的绿军装，挥舞着铜扣皮带，站在场院的大会主席台上乱跳乱叫，……”结果这些学生还是在26日晚开了批斗会，打了人。陈风雨等到市委搬兵制止武斗却因市委门口发生“八二六事件”而未果。再过几天，北京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学生也来了。他们说，文革小组里不能有“出身不纯”的，于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陈风雨退出了领导岗位。后来他们在10月成立了“八二五造反团”。（陈风雨《青春记忆》，风雨男人博客，2005）

这也是“红八月”里另一“三轮二社事件”，只是没打死人而已。干部子女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只认血统实际是身份（不鉴别是否谣言），所以支持工人造反派。这种情况得以发生，也和当时的天津市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单位内造反有

关。

所以，三轮二社事件发生在两大潮流的时间空间交汇点，基本上属于“红八月”的事件之一。党支部书记陈良谋是“红八月”的牺牲者。

可是，我们知道，北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8月5日被学生群殴致死后，北京市委的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没人组织追悼会。天津工商联副主任、对解放天津有功的“面粉大王”孙冰如被红卫兵打死，也没听说谁表示“公愤”。至于那些在海河里漂流的尸首，至今也没人统计数目，也没人给他们立纪念碑。怎么这个三轮二社的党支部书记死了，就能“激起公愤，先后有2400多个单位、49万多人到三轮二社追悼”呢？要知道那时是文革时期啊！当然对陈良谋也没树纪念碑，但被尊为天津市的烈士，每年隆重纪念至今。

再说北京女附中的卞校长被打死了。谁打死的，50年后的至今也没个说法，更不要说追究责任了。北京“红八月”中上千死难者血案责任者的刑事责任，也被陈云一笔勾销了。打死天津耀华中学的教师范景城的凶手、打死天津工商联副主任孙冰如和秘书长车重远的凶手也无人追究。可是，对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三轮二社事件，市委很快进行了处理。

“市委书记处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以后，万晓塘果断地拍板，依法严惩打人凶手。他说：如果市委对这样的事也放任不管，那么就会有許多坏人，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为非作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的生命财产就不能得到保障，‘文化大革命’也会搞乱。经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打人凶手大多数在历史上都有罪恶。于是，遵照市委指示，法院对12名打人凶手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和死刑，人心大快。”（谢燕《万晓塘的最后岁月》，《谢燕先生文集》，夕阳晚晴，2014）

陈良谋于9月1日被害，万晓塘于9月19日去世。所以市委对三轮二社的处理迅速而坚决，说明市委完全掌控了当时看似混乱的局势。至于那些漂泊在海河里的尸首，不属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所以他们的“生命财产”无人去保障。也说明，血腥的“红八月”中的暴行完全是在市委的纵容之下进行的。

这可能是京津两市在“红八月”里唯一严肃处理的事件，而且一件命案要12个人被判刑也是空前的。之所以是唯一的，是因为处于两大潮流的交汇处。只有干部子女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才那么凶残，能把人打死。而碰巧有运动初期遭到迫害的造反派在“红八月”里报复当权派。血统论红卫兵支持了造反派把两者联系起来，使得陈良谋成为“红八月”里为数很少的当权派牺牲者之一。

从铅印传单《谁是三轮二社反革命案件的罪魁祸首？！》中列举的坏人事件责任者来看，当局肯定把红卫兵撇在一边，只处理了工人中的责任者。

在“红八月”里，普通老百姓，甚至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命如草芥，死个人像

踩死一个蚂蚁，可是这个党支部书记死了，死得轰轰烈烈像国家元首一样。这是为什么？

从当时的隆重悼念到今天的尊为烈士，毫无悬念地向世间宣告，党支部书记这个职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如果侵犯了，多达 12 个人要被严厉惩办。打死人当然应该追究。事件本身是以暴易暴，但天津法院的判决也同样是以暴易暴。

这种对类似事件处理结果的强烈对比显示了我国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人的地位是多么不平等！虽然党的支部书记在经济收入上未必占便宜，但这样的政治身份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即使在关于当代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反面人物绝对不能是党的书记，只可能是行政干部，至今仍被称道的文革中拍摄的影片《创业》中也是如此。

同在“红八月”里被打死的卞仲耘还是个党总支书记，怎么就“打死就打死”了呢？原因是，在这个事件里，卞的身份不是党的干部，而是“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命不值钱。至于天津工商联的“面粉大王”之类的，更属于敌人之列，打死更是理所当然。在北京“西纠”的通令中早就把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并列，算作“黑六类”了。

对于这样极其罪恶的等级制度，至今仍有人十分留恋，想回到五十年代去。所以至今“红八月”的受难者仍不能得到应有的纪念，陈良谋一人除外。

（2015 年 8 月 16 日）

【史林一叶】

彭湃一家文革悲剧的真相

杜钧福

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农民运动领导人，在 1929 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属一家又遭到空前的灾难。他的九十多岁老母被监禁，他的儿子彭洪被抓走后杀害，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也相继遇害。

这一惨剧实际开始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彭湃的母亲周凤就被批斗过，后来由于对彭湃的高度评价，他们一家作为革命烈士遗属受到中央的关怀。彭湃的儿子彭洪曾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 年在批判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后重新启用。1964 年，基于他的申请，被调往广州，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革命母亲”周凤被打为“地主婆”。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某当时在海丰煽动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大天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并攻击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被加上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种种罪名，被长期批斗百余天，返回广州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

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丰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月26日，他们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电报，声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于是各公社组织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持枪武力围剿。被围剿的干部群众上山躲避，彭湃侄儿彭科也在内，但在29日被对方发现。一个姓洪的人大喊“我要报仇！”，将彭科头颅砍下。之后，彭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也相继遇害。

以后这些杀人者继续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员得到昭雪。

以上事情经过可见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但是看过这些报道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和彭湃及其亲属有那么大的仇，姓洪的要报的是什么仇以至于砍头才能泄愤？

我们考察事情发生背景。《海丰大事记》的叙述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海丰的‘四清’运动转入‘文革’，‘四清’工作团诬指原县长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干部为‘提高彭湃、贬抵毛主席’的‘黑帮’。海丰的‘四清’运动被转移为反彭湃的宗派斗争，并发展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红宫文物陈列室被封闭。撤销海丰县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6月11日，90多岁的彭湃烈士母亲周凤被封锁软禁，一个所谓‘声讨反党分子’彭洪、黎连平等地方老干部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8月底，‘四清’工作团撤销了彭洪、张顺等一批原县委地方领导干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交群众进行批斗。”

“9月1~11日，分别在海城、汕尾、捷胜、梅陇、公平和陆丰东海等六处召开群众大会，对彭洪、黎连平、张顺等老干部进行批斗。”

这是文革开始时期的运动状况，和广东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是 50 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延续，即批判“地方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原来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

再看 1967 年：“县内部分群众分别组成‘人总’（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维护彭湃烈士英名为宗旨）和‘左委’（革命左派造反委员会，坚持反彭观点）两个派别，通过大字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展开派系斗争。”

按照文革一般规律，所说的“人总”应当是造反派，“左委”应当是保守派。但是《海丰大事记》忌讳造反派保守派这些词。

再看下面：“8 月 26 日，由于支左部队公开支持‘左委’压制‘人总’派，海丰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全县 93 名干部群众被杀害，3000 多人被打伤，其中 400 多人被打成重伤或残废。彭湃烈士的亲属彭科惨遭杀害。在这次事件中，非法动用国家资金 6.6 万多元，粮食 55 吨，布匹 3000 多米，给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时称‘八·二六’事件。是年冬，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大批群众从‘左委’退出另组‘红旗’派；‘左委’也改称‘东风’派。次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被揪斗和监禁 1948 人，非正常死亡 367 人，其中中共党员 41 名，彭湃烈士亲属 6 人，老赤卫队员 12 人。”

支左部队公开支持保守派“左委”也是合乎规律的事。所以“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后台就是支左部队。但是，是年冬，为什么“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呢？

原因是广东的大形势。“从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十四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在多数场合下，周恩来的神情、语言都明显偏向红旗派。”（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因而广州军区也不得不改而支持造反派红旗派，至少“表面作态”如此。

《海丰大事记》也反映了当时的海丰的文革已纳入广东省的两派斗争，所以两派分别改称“红旗”派和“东风”派。

但是到了 1968 年，风向再变。“4 月 9 日，海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 55 名委员组成。设常委 15 人。主任边同印，副主任黄迎、王凤翥、陈星明、甘赛梅。接着，县直属单位和各公社都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8、9 月间，红宫、红场受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红宫改名为‘阶级斗争展览馆’，红场改为‘人民公园’。”

所以，从广东省文革的发展和两派斗争的历史来看，不难对彭湃亲属被害事件作出解读。简单地说，就是保守派在部队支持下屠杀造反派。这不是仅仅发生在海丰一地的事情，而是血雨腥风遍及全广东省。

海外学者苏扬《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编，田园书屋，2007）中利用地方志统计了 57 个县中有 28 个发生过集体屠杀事件，有 6 个县屠杀人数超过 1000，最严重的阳春县在 1968 年 8-10 月共屠杀了 2600 人。广东的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针对造反派。海丰的“八二六”事件虽然发生较早，也应属于两者，因为杀害对象是后来属于红旗派的造反派，也因为彭湃的亲属的家庭成分可能偏高。

这一冤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杀人凶手长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长期掩盖，原因就是杀人的是军队支持的保守派，被杀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造反派。这一冤案之所以终被平反，杀人者得到处理，是因为彭湃的名声太大。广东省的其余被杀者就没有那样幸运了。

当然这里面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在两派斗争中，未必是一派完全正确，特别是在他们得势的时候。姓洪的要报什么仇？未必是在算彭湃当年的账。此外，四清里说彭湃是“左倾”未必错。熟悉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徐向前就委婉地说过：“……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个彭湃居然给农会积极分子规定杀人数额和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这里面想来有不少是冤冤相报的。

有人总结这样的规律值得我们深思：“……‘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昔日的‘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当代江西简史》，转引自姚蜀平《文革中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

彭湃尚有次子彭仕禄，留苏毕业生，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应该说是功劳很大的了。但是另一知情人孟戈非在他的《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中对这位彭某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中谁是谁非，我们圈外人当然无法评判。

（2013 年 5 月 27 日）

【史林一叶】

文革中的高等学校搬迁

杜钧福

文革中，全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不但经历了造反、夺权、内战、清队、清查“五一六”等种种磨难，还经历了搬迁、改制、合并、撤销等折腾过程，损失极大。

一

高校搬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备战。文革前，对战争危险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

1964年，越战逐步升级，苏联也在中苏边境陈兵，战争危险迫近我国。在毛泽东坚持下，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从解决“吃穿用”变更为“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8月，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三五”的指导思想再次改变，确立了三线建设为主的决策。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其中提到：“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是在此时决定在三线建设分校的——准备在战时全校搬迁，如同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1964年10月，高教部通知北大、清华这一决定（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当时北京大学已经开始建设位于北京十三陵地区的新校址，但是在中央决策后，立即到三线选址，决定在陕西汉中建立分校。1965年3月，教育部批准了北大汉中分校的建筑计划任务书，工程代号653，于文革中的1969年10月搬迁，将与国防工程有关的技术物理系、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无线电电子学系搬至汉中分校，在此滞留十年之久，文革后迁回北京。

清华大学则于四川绵阳建立分校，称651工程，原计划迁5个系，后只将无线电电子学系迁去。1966年11月，头一批700多师生和家属迁往绵阳工地，实际上是参加建校劳动。1971年12月，分校大体建成，无线电电子学系其余部分搬去。

清华、北大两分校是1965年高教部“四大工程”之二。其余两项中还有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决定在四川自贡创建四川分院，称652工程。1979年，该校改为四川化工学院，大部分教师撤回。

此外，1965年5月，南京大学决定在湖南桃源县创建中南分校，称654工程，预计1967年招生。工程完成了一部分而中缀。

除以上四大工程外，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唐山铁道学院在文革前已在四川峨嵋开始建校。文革开始时，部分学生和老师到峨嵋参加建校劳动。文革中，大部分学生返回唐山，部分留在峨嵋，在两地搞文化大革命。1971年全校搬迁峨嵋，称西南交通大学。现在这一学校搬到成都郊区。在搬迁过程中，学校教职工都是携家带口和全部家当连同蜂窝煤炉及蜂窝煤、木柴一起搬去的，有人还特地购了水缸。千里运输途中，从汽车到火车再到汽车都是自己装卸的。搬去不久，蜂窝煤就用光了，于是开始自制蜂窝煤。

建于1947年的大连医学院于1965年整体搬迁贵州遵义，改称遵义医学院。

文革前就已决策并开始建设三线校址的这些学校的搬迁，在文革初期实际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69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发生边界武装冲突，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之时，才开始紧急搬迁。

二

1969年3月2日，中苏间在珍宝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此后，边界形势严重恶化。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各地军民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9月11日，周恩来和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机场会谈”，随后于10月20日中苏开始进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认为此时是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可能发动进攻的最危险时机，所以从10月中旬，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开始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撤离，中央领导疏散外地。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进入1970年以后，情况稍为缓和，但学校撤离仍在继续进行。1969-1970年是高等学校集中搬迁的时期。

虽然这一时期学校的搬迁是在战争阴影下进行的，但搬迁的原因仍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许多学校的搬迁是作为文革“斗批改”的一部分而进行的。

1968年9月7日，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了斗批改问题。当然，所谓斗批改，重点在“改”上。而“教育革命”是“改”的重要内容。

在“教育革命”中，除下放大学毕业生去解放军农场进行“再教育”以外，就是“大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一些学校就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设计未来大学的蓝图。

在这一道路上走得最早的可能是同济大学。他们在探索“办学方向”中于1967年和设计、施工单位一起办了一个“五七公社”，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予以肯定。1969年9月，“五七公社”迁往皖南山区，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育，并于次年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1971年“五七公社”迁回上海。

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蓝本，提出建设“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设想。基地首选河南南阳，其次是江西，计划1971年做到粮食自给，并完成教学、科研、校办厂的重要基建任务，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进行了这样的基地建设。1969年，清华大学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建立清华大学试验农场，2000多教职工来此劳动。10月，北京大学在此建立江西分校。两校共6000余人在这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流放生活。他们之所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结束了这场噩梦，据说是因为有人写信向周恩来反映意见，说不要再派人来此轮训了，以免更多人感染上血吸虫病。

这种下放基地类似于党政机关办的“五七干校”，但包含更多的内涵，即期望承担更丰富的功能，而不仅是轮训锻炼干部，实际上除了参加农业劳动外还收了一届工农兵学员。它和搬迁这个概念的区别，是不明确原来的校址是否保留，但是至少北大、清华是保留了，所以在两三年以后得以迁回北京。

在安徽省，“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秋酝酿一个缩小‘三大差别’、改造上层建筑的‘宏伟’计划，即大规模的‘下迁’计划。先是大专院校广大师生，在工宣队、军宣队带领下，浩浩荡荡离开城市，步行几百里到工矿农村搞‘斗、批、改’。学校食堂的炊具、实验室的仪器、图书资料等，一卡车一卡车地拉到农村驻地，打算长期安家落户。教职工多数是举家搬迁。到1969年初，全省大专院校1.3万师生全部搬迁到工矿、农村，与贫下中农或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携手批判资产阶级。”（侯永主编《当代安徽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1969年12月，原有14所院校保留6所，撤并8所。

在江西省，“复课闹革命”以后，将全省13所大专院校关掉8所，其余5所合并搬迁至边远山区：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大学、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成江西井冈山大学，迁至井冈山山区拿山公社。江西医学院、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成江西医科大学，迁至吉安县青原山公社。原校舍均被工厂部队占用。（危仁晷主编《当代江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此处，“下放”或“下迁”和“搬迁”概念已经没什么区别了。除此两概念以外，还有一个“战备疏散”的概念。在1969年10月的战云密布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和学校领导领会的是这一意思，即临时找一个地方躲避一下。例如辽宁省革委会此时做出《关于大专院校办在农村的决定》，并安排辽宁大学到北镇县高山子劳改农场办学。全校师生员工于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分两批搬迁到高山子劳改农场，在此劳动。1970年8月迁回沈阳。

当时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要求所有大学战备疏散，在1970年的《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中，并没有相应明确规定。但是在当时战争恐怖的环境下，许多学校从战备疏散变成了正式搬迁。由于过程的仓促和混乱，其演变过程至今不明，成为历史悬案。在这其中，“以革命的名义”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中国科技大学先是选定安徽安庆，匆忙中搬去900人，发现根本没有居住条件，于是四位革委会常委急忙返回学校告知下一批暂别去了。这一行动被安徽省驻校宣传队定为“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谁敢对这一搬迁置喙？

北京电力学院在1969年10月“战略搬迁”时，领导意识到以后还要搬回北京，所以把搬迁地点尽量选择接近北京，先在邯郸地区安家，分散在岳城水库及邯郸、码头、峰峰三个电厂，1970年又迁至更接近北京的保定，称华北电力学院（现华北电力大学）。但是学校本校始终未能迁回北京，只在北京开办了分校。

三

高等学校在文革中的搬迁、合并、撤销的另一原因，是对高等教育的取消主义和实用主义。1970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指出，建国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这“两个估计”对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成绩作了全面否定。

1971年9月四川省革委召开省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将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四川林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予以撤销。

在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下，广州著名的暨南大学于1970年2月宣布撤销，全校9个系被分配至其它4所高校，学生被送往农场劳动等待分配。

1970年6月24日，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转的《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提出，山东大学理科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校址设济南市，在平阴县建立农业生产和战备疏散基地。山东农学院将山东大学生物系

并入，校址设在泰安。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校址设在曲阜。山东师范学院迁往聊城。山东医学院与山东中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医学院，校址迁往泰安地区的楼德镇。青岛医学院迁往惠民地区北镇，下放惠民地区办学。昌潍医学院下放昌潍地区办学。山东煤矿学院迁往肥城矿区，矿校结合办学。撤销山东财经学院。（《山东大学百年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在这场撤并行动中，首当其冲的是文史类学校。像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外交学院都被撤销了。而理工科学校和专业则被赋予实用性的功能，特别在国防方面。例如北京邮电学院被通信兵收编，称北京电信工程学院。而中国科技大学，在1971年也曾一度被安徽省和三机部双重领导。而从山东大学理科组建的山东科技大学，则被要求以任务带学科，负责培养国防工业的科技人员，开展国防科技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由国防工办管理，

四

在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国防院校也遭受很大损失。当时整个部队向战时体制转变，精简机构，缩编人员。但另一指导原则是，解放军本身就是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大学校里还开办那么多学校，学校套学校干什么？

1969年2月19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通知所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125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45所，技术学校65所，飞行学校15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1，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2，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的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基本上保留；3，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43所，减少83所。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1所，工程技术学校20所，医务学校6所，兽医学校1所，飞行学校15所。（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和毛泽东》，《强国军事纵横》，2006）

笔者当时正在解放军农场，知道在批判1964年“大比武”以后，部队的主导思想就是极端轻视业务训练，认为打仗主要凭勇敢。

这次裁并影响深远，例如在海军：“在这一场浩劫中，20年来苦心建立起的

14 所海军院校被砍掉了 9 所。教师人员流散，校舍、营具、教学场地和教学设备遭到很大破坏和损失。幸免于难的 5 所院校，其中 4 所来个大搬家。学制缩短，教学制度废弛，教学质量直线下降，几乎处于停办的状态。海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而海军院校成了这个重灾区的重点户。”（刘道生《刘道生回忆录》，海潮出版社，1992）

文革前，位于哈尔滨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是和北大、清华齐名的重点学校。1969 年被要求内迁，1970 年正式分迁。学校主体和院机关划归七机部迁往长沙，成立长沙工学院，即现在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把空军工程系划归三机部，迁往西安，并入西北工业大学。海军工程系划归六机部，留原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一所名校从此解体。

1970 年军事工程学院从哈尔滨迁往长沙时，要求合并专业、精简人员，但是搬迁量仍很大。从 7 月 1 日至 11 月 12 日，共有 10 列火车共 550 个车皮从哈尔滨发往长沙，共运输物资 2.5 万吨，人员 1447 户。

像解放军艺术学院这样的学校被撤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该校在文革初期是造反策源地。其群众组织“星火燎原”在全国各地和北京三司、清华井冈山并驾齐驱。该校被解散后，学生们都被发配至“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军区）。

当时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将三所军医大学“调防”：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调西安，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调重庆，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调上海，时人将这种毫无意义的搬迁称为“推磨”。原因据说是二军医大的“红纵”造反太厉害，曾让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吃够苦头，所以调他们到比较艰苦的西北去，给点颜色看看。所以在 1975 年 5 月又奉命迁回原地时被说成是“为利于军医大学长远建设，消除林彪及其死党邱会作一伙造成的严重后果”（《第三军医大学校史》，2004）。

五

在地方学校里，遭受最大折腾的是农林类，以及部分工矿类专业院校。因为从极左思潮角度，认为它们应该办在农村或接近工矿的地方。毛泽东又有“农学院办在城市里是碰鬼”的说法。它们在文革中大都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迁徙。

这一过程实际上开始于文革之前。例如早在 1965 年，石油部就在研究北京石油学院迁址厂矿的问题。1966 年 3-5 月，该校 2000 余名师生分赴大庆和胜利油田建校。1969 年 10 月 21 日，石油部军管会下达了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随即全校师生家属在两星期内乘三专列迁往东营。该处现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

北京矿业学院则于 1970 年迁往四川省合川县（现属重庆），改名四川矿业学院，文革后的 1978 年又迁江苏徐州，称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本拟迁湖南石门县，后于 1970 年改迁湖北江陵，称湖北地质学院。1972 年，该校在武汉设立武汉分院。

1969 年 10 月，林业部军管会决定撤销北京林学院。11 月 25 日，工宣队、军宣队代行革委会职权，开会宣布战备疏散，动员搬迁，但隐瞒撤销决定，实际上是将职工骗出北京。11 月 28 日开始全院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分批迁往云南，下放到滇南、滇东南、滇西、滇西北各林业局和林场参加劳动。在下放过程中，人们得知撤销学校的决定，纷纷向国务院反映，最终国务院于 1970 年下达不能撤销的决定。于是在 1970 年 4-5 月，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学校人员集中在丽江，在此办学，改名丽江林学院。但由于此处缺乏办学条件，又于 1972 年 3 月，全校迁往下关，称云南林业学院。此处选址问题难于解决，职工家属均临时住在白族农户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校职工家属于 1973 年迁往昆明市安宁县建校，并开展教学活动。在这几年里，一连串的错误决定使这个学校濒于绝境。但是各种复校的意见都被批判为“复辟”活动。直至 1978 年底，才决定搬回北京，恢复原校名，现称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校史，1952-2002》，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北京农业大学在文革中的搬迁过程更为曲折。1969 年战备疏散，绝大部分教职工和家属疏散到学校所属河北省涿县农场，还有大批师生下放到河北省武邑县农村劳动。1969 年 12 月，农业部军代表宣布北京农大撤销。1970 年，北京校舍大部分被军队占用，涿县农场的大部分也交给 38 军。1970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农大还要办，但此时大部分校舍已被占用，学校进退维谷，国务院指示农大搬往陕西。1970 年 8 月 12 日，召开搬迁动员大会。次日，先遣队即赴陕西延安地区甘泉县。之后职工及家属开始搬迁。农业部军代表表示，搬迁先迁家属，搬家属先迁户口，以绝后顾之忧。到 1970 年底，基本安顿下来，并开始教育实践和科研。1971 年，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一度和延安大学合并。1972 年底，通过来陕西视察的王震向国务院反映意见，1973 年国务院决定将学校搬到河北，改名华北农业大学，学校随即搬到河北涿县建校，收回大部分原有的农场，在此地办学，但受到地方势力的骚扰，直至 1979 年迁回北京，结束了十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49-1987》，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5）。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于 1970 年搬迁至重庆北碚区，校名先后改为四川农机学院和重庆农机学院，1975 年又迁到河北省邢台市，再改名为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1979 年迁回北京市原址办学，后并入北京农业大学。

类似于北京林学院的骗局但居然成功了例子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69

年 10 月，根据上级指示，该校迁至河南固始县，然而刚到新址，对外贸易部就宣布该校“就地撤销”，直至 1973 年复校。

六

其它一些原因也造成文革中的高校搬迁。例如 1967 年初，天津划为直辖市。1969 年 10 月，河北省和天津市决定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隶属河北省管理。12 月河北大学开始迁出天津，理科迁保定（当时将保定定为河北省会），文科迁冀县。1970 年 6 月陈伯达到天津视察，得知河北大学已经开始外迁，他说：“河北大学留在天津不是很好吗，不要搬走了吧？”于是，已先行迁出的师生连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陆续返回天津。8 月底，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毛泽东批判，9 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下令河北大学仍执行迁出天津的决定。理科照迁保定，文科改迁隆尧县唐庄。11 月文科师生也迁至保定。至此，河北大学最终定址于保定。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学校的几次搬迁，使河北大学实验室及仪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到 1970 年学校最终搬迁到保定后，各类完好无损的仪器设备仅剩 5000 余台（件），总价值 200 万元左右，损失达 60% 以上。（《河北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从上述北京农业大学的搬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校在短时间内搬迁得如此迅速和彻底，除了政治压力和受到“明天原子弹就扔到头上”的恐吓外，还可能有个利益追求因素。我们注意到，很多学校搬迁或撤销后校址被部队占据。例如农大的校址分别被国防科委、二炮、38 军占据。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址被铁道兵占据。天津的 66 军占据了天津师范大学的全部校园作为军部。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址归属了军乐团，以至于该校复校时只能另寻新址。1970 年 2 月，广州暨南大学被宣布撤销，全校师生在三天内迁出，留下“营房和营具”被东北迁来的军医学院占用。至于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被二炮占用，文革后多次交涉，以至激起学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当时各学校及主管机构都是军代表主事，他们可能代表这些军事单位的利益。一些学校的校史记述中，实际上暗示了这一点。

1971 年林彪事件以后，部队势力消退，他们退出了部分占用校舍。特别是 1972 年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被揭露后，中央以文件方式令他们退房（杨继绳《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炎黄春秋》2011 年第 3 期）。所以在文革以后，被占用的大中小学校舍中，部队所占并不占主要地位。如 1978 年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中显示，在当时仍被占用的 1761 万平米校舍中，企事业单位占 1018 万平米，党政机关占 333 万平米，部队占 233 万平米，其它单

位占 176 万平米。

这些在文革中经历了搬迁的学校在文革后最终有三种命运。

一种是彻底搬去未能返回，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河北大学、大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

一种是返回原址，如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机械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方交通大学）。

还有一种是未能完全搬回，但在原址建立分校，如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大学）。

此外，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大学）、外交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校被撤销后，均于文革后恢复办学。

（2011 年 8 月 30 日）

【史实考订】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回京后行止考

杜钧福

1966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结束南巡后回到北京，严厉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派遣工作组的方法，宣布撤销工作组，使运动形势出现新的局面。这是文革史中非常关键的几天。

但是，对于毛回京后的行止，文献均语焉不详，甚至彼此抵牾。笔者搜集了一些文献中关于此事的叙述并加以比较。其中我们尽量依靠原始文献和早期出版物。这里所说的“行止”，是指召开会议情况，包括刘少奇在这几日召开的，不包括毛泽东安排中央文革人员到高等学校活动的情况，因为这些活动是公开的，叙述中分歧很少。

1. 当事人回忆

当事人回忆是珍贵的原始资料，在细节上比较真实，但日期不一定准确，容易出现记忆上的差错。再者，其中也有人云亦云或猜测的地方，应注意。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中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有两段。第一段是“怀仁堂会议”，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会。

“怀仁堂会议可能是 14、15、16 日一直开到 18 日。也可能中间有停顿，或者白天不开，晚上开。现在记不准确了。会议有汇报，有讨论，因为每天都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7 月 18 日下午，我参加了怀仁堂的会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总理等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少奇、小平要我们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情况，我汇报总的情况，并在他们汇报时插话。陶鲁笏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陶鲁笏是大学委员会主任，大学委员会还是总理批准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鲁笏的意见。陈毅在会上发表意见较多。支持我们的看法的是多数，后来人家说‘你们都讲话了’。谢富治没吭声。总理参加了一小时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动。”

刘少奇批评中央文革，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邓小平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会议进行期间，江青悄悄进来了，坐在后面。

在收入这篇文章的书中，编者根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在附注中指出上面所说的 7 月 18 日会议应是 7 月 19 日召开的。

这个会给李雪峰印象很深，所以记述的细节应该准确。但是江青是 20 日才回京的（见后面分析），陈伯达也没参加 19 日的会议。所以所描述的会议，不是在 18 日，也不是在 19 日，而应在 22 日。

李雪峰文章第二段是从毛泽东回到北京讲起。

“7 月 18 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来。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江青先去。少奇听到了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少奇知道有事了。

“24 日晚 8 时半，毛主席在丰泽园召开会议。我和吴德都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参加。据说少奇听到消息马上赶到丰泽园，看到外面停着很多车子，就没有往前走。另一种说法是，他走到门口，警卫不让他进去，只好回去了。

“到会的大区书记一看两位主帅没有来，知道情况有变，都比较紧张。我也没有敢记录，是会后追记的。

“开始让我汇报。我的话不多，刚说到‘北京大学七个人的大字报，现在七个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话：‘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钉子，

我就没有再往下讲。

“毛主席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他的意思是批评少奇、小平封锁他。

“康生讲：‘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主席说：‘什么不多，没有！’主席对这些事情都是亲自抓的。

“陈伯达是否到会已不记得，因当时正起草十六条。后来我从安徽回到北京后与吴德谈过两天，他记得参加的人还多。

“主席说：‘依靠工作组不行。教授，你们了解？工作组原来搞什么的？搞军、工、农。学校情况你们了解？’意思是工作组不行，确定要撤工作组。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谈一下’。

“主席说：‘你谈，你去传达。’主席说话的口气表面上平和，实际上很重了。

“散会后，我有事情请示少奇同志，到他家一看，陶铸也在，刚刚开始向少奇、小平传达。少奇叫我坐下，参加他们的会。我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就走了。”

“7月25日主席召集会议，仍然以工作组为主要议题，又和缓地讲了若干道理。”后面又说7月24、25日在主席那儿（丰泽园）开会，中央在起草“十六条”。

在这一段里，说毛泽东回京后，有江青先去一事不符合事实。又说24日会在丰泽园，根据后面的穆欣资料，应在钓鱼台。至于开会细节应准确。

吴德《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主席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主席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我们执行。毛主席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我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我们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主席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吴德可能看了李雪峰写的上述材料或与他商量过，所以对汇报会的日期和江青后到一事的叙述和李雪峰一样。他所说 23 日的会，在李雪峰回忆中是 24 日，看来李雪峰可靠，而地点，吴德说在钓鱼台，和下面穆欣说的一致，应可信。

穆欣在《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载《回首“文革”》）也谈到了毛泽东回京后的行止。

他说，陈伯达在 7 月 13、19 和 22 日中央会议上三次提出撤出工作组，都被否定。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到陈伯达提议时检查道：“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毛主席回到北京当天，就要中央文革小组送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个学校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报；同时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又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有人说，毛泽东回京后偏听偏信江青的汇报，决定撤销工作组。其实，江青一直留在上海，比毛泽东还晚两天回到北京。这年 11 月 28 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说：‘毛主席是 7 月 18 日回到北京的，我是 7 月 20 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回京不久，就住进了钓鱼台第 12 号楼。7 月 24 和 25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过两次会。7 月 24 日午后，毛泽东在钓鱼台 12 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开会，讨论准备提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见面。当时他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站在大厅中央等候大家。会上毛泽东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

做法，有些工作组阻碍运动。

“7月25日，毛泽东又在12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28日，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

此文指出毛泽东在回京第二天，即7月19日“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无其它材料佐证，而且下面的《刘少奇年谱》中也不载该日刘少奇单独向毛汇报事。此说暂不取。又“毛泽东回京不久，就住进了钓鱼台第12号楼”和王力的叙述基本符合。但此文对江青回京时间做了澄清。又他说的24日会的具体时间与李雪峰所述不符。

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中对这段经历也作了类似陈述，但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没提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

郭影秋在《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炎黄春秋》，2002年11期）中说：“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恩来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刘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派工作组，一直争论不下。

“接着又来中央扩大会议，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我及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又发生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他这么一说，包括当时了解情况的李雪峰等人都不好再讲什么了，都不说话了。会上还就是否撤工作组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撤，有人主张不撤，即使是认为有问题的可以撤下来，再派另外的人去。”后来又提到曹轶欧写给康生条子，要求罢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官的事。

因为22日的会上，周恩来参加一小时就走了（见李雪峰回忆），不大可能参加争论，所以郭影秋所记忆的第一次会应为19日的会。第二次的会应是22日的

会，但是，7月16日李雪峰和吴德就到北师大代表北京市委罢了工作队长孙友余的官。所以此处记忆有误。

王光美访谈录：“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毛泽东回京住丰泽园，王光美回忆应可靠。她实际上也认为江青比毛泽东晚回北京。几次会的日期，王光美回忆也比较可靠。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为1960年列席书记处会议，1964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青说不行，非要我从八号楼搬到十六楼。八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伯达住十四楼，江青自己住十一楼，毛主席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

此说证明毛泽东只是在开会时住钓鱼台。

2. 年谱

年谱编纂者掌握大量文件资料，内容特别是日期应较准确，但是一般较简单。

《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7月18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当晚，在怀仁堂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任。”

7月22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发表声明。”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

7月24日、25日 “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关于工作组的材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22日，“参加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部门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7月20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7月22日，“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出席首都百万群

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7月23日，“晚，到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

7月24日，“晨四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并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作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在刘少奇处开会后，约国务院各口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时再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知道运动？”

7月26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7日，“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到刘少奇处。”

此书谈到7月20日到毛泽东处开会事，为其它材料未见，估计可能为凌晨，即19日刘少奇主持的会后。又7月23日会，《刘少奇年谱》不记。可能较19，22日两次会短而不重要。

3. 大事记，文革史

文革中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有以下记述：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2日，“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笏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①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②‘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份还是好的，等待。”

7月24日，“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撤工作组。”

7月25日，“上午，李雪峰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

7月26日，“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

其中，关于7月22日的会议情况包含若干真实信息。

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的当天即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7月19日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抨击派工作组，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在这期间，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7月23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直到7月23日，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撤工作组。根据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7月23日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就是：‘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王年一的书对这段历史虽然叙述不很详细，但只有江青于毛泽东回京当日去汇报不确实，其余部分还都可信。他转述了毛泽东的一些话，但没说是是什么场合

下说的。

综上所述，目前能见到的大多数有关材料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都值得推敲，很少有完全可信的。现在根据对上述材料所作的分析、比较，去伪存真，试图梳理出所说的几日内发生的事情如下——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仍住丰泽园，当天即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看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个学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简报。刘少奇闻讯前去被挡驾。

7月19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书面建议要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人的意见，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在争论工作组问题时，邓小平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恩来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刘少奇马上反驳道：“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

7月20日，凌晨，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

江青回到北京。

7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游行，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出席。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也参加，周恩来听了一个小时后离开。江青后到。会上吴德、胡克实、李雪峰、陶鲁笳等汇报。薄一波发言说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反干扰”是必要的，学生中有右派分子。陈毅多次发言。陈伯达又提出撤销工作组被否定，邓小平、叶剑英、刘志坚等均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批评中央文革，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康生说：“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邓小平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

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刘少奇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

7月2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其中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

晚，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参加。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7月24日，晨，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谈“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并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作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毛泽东在钓鱼台12楼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准备提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稿。此时他已搬进钓鱼台。此会陶铸、康生等参加，刘少奇、邓小平未参加。

首先由李雪峰、吴德汇报。李雪峰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和北京的情况，毛泽东表现很不耐烦。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

生。他决定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

会后陶铸、李雪峰去刘少奇家传达会议精神。刘、邓、陶等在刘家开会。

7月25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7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以上所归纳的，只可说是根据我所见材料推论的最大几率事件，未必是真实经过。特别是还有几个问题存疑：

刘少奇在7月19日是否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穆欣文章谈及此事，但其它材料未见。按通常理，似应有此举。但穆欣也许指的是20日凌晨的会。

刘少奇在7月19、22和23日主持的三次会，是否性质一致，是什么会？不少文献如郭影秋所说：“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是毛泽东什么时候的意见，回京后还是在这以前？

一些会议的具体时间（上下午或晚上）尚不能确定。尤其是7月24日的会，王年一的书和文革期间的大事记均记为上午召开，但穆欣的记忆是“午后”，李雪峰的回忆是晚上八点半。分歧较大，究竟是一个会还是两个会？按毛泽东的作息习惯，上午开会可能性不大。但是陈伯达、江青、康生于下午到广播学院讲话，据记录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12点，所以他们不可能参加下午和晚上的会。穆欣的回忆可能有误。此外，李雪峰的回忆中说，康生参加了24日晚上的会。

此外，当时领导开会，经常从晚上一直开到凌晨而跨日期，所以确定和分辨是哪一天可能存在误差，甚至将一个会说成两个。

从本文上述分析表明，文革史的研究中，在不少重要问题上我们尚在暗中摸索，一些历史著作盲目相信、引用未经证实的材料，以讹传讹，误导读者。笔者所见文献和见识、能力均有限，仅就所见者作如上分析，本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关注，求教于大家。

（2013年5月10日）

【史实考订】

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

杜钧福

《罗生门》本是一部由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经典电影。后来使用“罗生门”一词，则是指卷入某一事件的每个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谎言或只讲有利于自己的部分真相，令事实的全部真相难以为人所知。

看到芦笛先生在共识网上发表的文章《林彪为叶群开过“处女证明”么？》，与余汝信先生争辩，说林彪确实开过“处女证明”。对此事，我也觉得蹊跷，抱怀疑态度。但芦先生举出李雪峰和王力两人的回忆录证明此事，看来是确实的了。但是这又涉及李雪峰回忆录的真实性问题。我对这一回忆录也有所质疑，主要针对他1966年7月26日在北大东操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内容。

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详细的是李海文发表在《党史博览》2008年第2期上的《1966年夏北大见闻》一文。当时李海文是北大学生，作为群众一员参加了这次大会。

这篇文章说，在7月26日晚上的会上，群众性发言辩论之后，陈伯达讲话建议撤销工作组，建立文革委员会。康生则宣布了工作组的两大罪状。然后江青要李雪峰讲话。

“容不得我多想，看见江青走到李雪峰跟前，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大家屏息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李雪峰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此时，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接受中央文革的批评，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报上公布了毛泽东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大家知道毛泽东不在北京。毛泽东到底知道不知道北京派了工作组？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有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批准了没有？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成为多年不解的谜团。

“李雪峰所说的‘奉陪到底’被江青记在心里，到1970年华北会议时拿出来，成为李雪峰的一条罪证。”

这里说李雪峰讲话简短，看来就讲那么几句话。读者读到这里只能佩服作者

记忆能力，连李雪峰“风度翩翩”的样子和折扇的动作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了这样的细节，看来叙述的内容应该很可靠了。当然读者也对李雪峰敢于和中央文革当面“对着干”的骨气感到由衷钦佩，这正是大家心目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

但是，这是真的吗？

李海文文章的内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看过李雪峰本人的回忆录《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他回忆的在7月26日大会上发言的情况和李海文文章中的叙述完全一样，特别是讲话内容一字不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他们的回忆完全一样？尽管李雪峰讲话很短，经过几十年后，两人记忆竟然一字不差，实在惊人。有这种巧合吗？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李海文回忆的李雪峰讲话是抄的李雪峰文章内容，再加上“风度翩翩”等个人印象成分。倘如此，就是作者写作不规范之处。你抄李雪峰的，就应该注明出处。从知识产权角度说，倒没什么了不起，李雪峰及其后人未必计较。问题是读者看了，会真以为李雪峰当时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将可能不甚可靠的回忆变成目击者的证言。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手头也有根据当时大字报转抄的记录稿。这些记录经层层转抄，已不知道原始的记录人了，内容肯定不完整，有错误，但正因为如此，才说明系原始资料，有极高史料价值。请看李雪峰讲话的记录稿：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组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也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

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主义（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红旗》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像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5月25日的报告（按：5月25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5月25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6月3日，新市委宣布成立，6月4日那几天敲锣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6月4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6月20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6月20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23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6月1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20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7

月10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场面，陈必陶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么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北京是首都，要看北京工作如何，对支持越南也作了一个好的开端，检阅……，这是国庆演习，证明了北京人民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们不仅搞文化，也搞武化，大搞军事训练，当兵保卫首都，把北京搞成坚强的地区。”

注意其中第二段中“党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原件中此处的“党中央”错记成“党主义”，我引用时改正了）。此外，第二段中的“农民”应是“你们”之误，我引用时也改正了。第五段中“6月1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可能也有记录错误。

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一记录稿是伪造的。它首先说明，李雪峰的讲话没有那么短，而是和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长度差不多。其次，讲话的内容和李雪峰本人的回忆，当然也和李海文的说法大相径庭。

关键问题是北大工作组是谁派的？江青在前一日的大会上开宗明义，说工作组是北京市委派的。记录稿中的李雪峰也是这样说的，承担了责任。但是李雪峰的回忆却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李雪峰在回忆中说的“奉陪到底”一词，在记录稿中也未见。

我说这是个罗生门。我虽不很相信李雪峰的回忆，因为很不可信。但我也不认为记录稿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记录稿包含着记录着或转抄者对内容的理解，记录内容和实际话语南辕北辙的事也曾有过，此处不赘述。但是李雪峰是在北大万人大会上讲的话，听众甚多，原则上不应该有大的歪曲。除上面引的记录稿外，所见记录有当时历史系学生马生祥撰写的回忆录《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文史精华》2006年第7期）中谈到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当时我有些崇拜康生；深感李雪峰讲话很尴尬，既要以领导身份作指示，又要对委派文化革命工作组作检讨。”又有佚名的当时中文系学生撰写的《北大五年》（《读网》，2006年）对此只讲了一句：“李雪峰也表态感激中央文革。”

我希望更多当事者回忆这些重要细节，给历史一个交待。

那么，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到底是谁派出的呢？

李雪峰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中说：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事件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他没明确说工作组是谁派的，至少不能证明是中央直接派的。

对此，李志伟《北大百年》（作家出版社，2008）一书说的比较清楚。而这些内容可能来自《北大百年记事》一书。

1966年6月1日下午，康生接到毛泽东关于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指令，4时许下达了广播此大字报的命令。他可能也在此时通知了华北局。

华北局通知张承先到北京饭店参加紧急会议，领取新任务。张承先于7时许到达时，见到北京新市委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个个面目表情严肃，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吴德向他说，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5月25日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组长，赶到广播前进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他们仍然讨论很长时间，到11点多才结束会议，离8时广播大字报已过去3个多小时。

晚11点，即聂大字报广播后3小时，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奉命到校门口迎接华北局和新市委负责人吴德等和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32人进驻学校。

这就是派工作组的过程，显然，工作组是由华北局指示北京市委派的。当然，也可能通过了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说是中央派的也言之成理，但是如果李雪峰说“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则非常不合情理。所以李雪峰在回忆录中叙述内容很不可信，包括那个莫名其妙的“奉陪到底”。如果他说这个话，当时就会挨批，用不着等到1970年的华北会议。

除去派工作组问题以外，在北大“六一八”事件性质问题上，李雪峰讲话的记录稿也显示与江青等人完全一致。记录稿不一定可靠，但是也未必完全假造。按其长度来看，李雪峰的讲话和参加会的其他领导说的差不多，绝对不是他自己回忆的寥寥几句。而且从讲话内容看，他的回忆很不可信，因为当时似乎不可能那样顶撞中央文革并把责任推给中央。当时的形势，并非如他自己和现今许多文章所说的，他和中央文革处于敌对的地位。

1966年7月中旬以来北大的形势，今天已难复原。根据《北大百年》叙述，7月12日，北大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发动群众。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先是很恼火，后在北京市委的推动下，利用这件事顺势下台阶。

事实上，在陈必陶大字报发表前，已有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派的两个工作组（北京市的工作组实际上只是几个秘书）到北大调查。这说明，当时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两方面均已采取措施，力图扭转“六一八”事件后形成的工作组整群众的局面。

15日上午，北京市委吴德、郭影秋来到北大，听取工作组关于陈必陶大字报的辩论情况。汇报后，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和左派的意见不敢提了。”“主要原因是工作组控制比较紧了些，运动就死板了。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这话已经说得非常严重了。

当天晚上9时，吴德再次把张承先叫到北京市委谈话，传达北京市委对北大工作组的批评，要求张承先召开北大积极分子会议做检查。次日，张在有3000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做检查，但仍坚持“六一八”事件确实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活动，反击是必要的。这话传到北京市委，吴德听后十分气愤。夜1时30分，他打电话给张承先，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估计。7月17日早上8时，张承先又被传到市委，吴德劈头盖脸地训斥他：“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竟然如此地顽固不化，如不改正，你是要栽大跟斗的！”12时30分，张承先赶到北大广播台做了补充检查。此时，他们还公布了工作组领导小组名单，或许为了显示北京市委的支持。

7月18日凌晨，吴德再次给张承先打电话，要他们对照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检查自己的工作，于是北大工作组上午开会学习、检查。同时，市委开会研究北大问题，北大工作组武振声参加。李雪峰在会上讲话，说：“北大6月18日乱打人，被打的都不是好人，有些人问题不大，但打人的有坏人，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整个估计这个事情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傍晚武振声回到北大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意见。张承先再次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做补充检查，并决定用三天时间用四大形式批评工作组。

我们注意到，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发生的事。北京市委对北大文革的立场已经比前一个月李雪峰发表“一个游鱼三个浪”讲话时转了180度。他们已从“反干扰”的立场转为高度肯定北大“六一八”事件、否定工作组。这一立场与中央文革并无不同。

6月23日李雪峰发表“游鱼”讲话，到陈必陶大字报发表之前只不过十几

天的时间，立场发生了显著改变。联系到陈伯达和康生也在反映北大“六一八”事件的第9号北大文化革命简报上画了圈，并因此被毛泽东责骂，中央文革在思想和行动上也有个转弯的过程。李雪峰和吴德的转变和中央文革是同步的，而且动力未必来自中央文革的指令，因为当时中央文革还没那么大的权威。虽然这段历史的细节尚待探究，但是他们都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是肯定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7月18日李雪峰把“六一八”事件评价为“万人革命的行动”一语很可能出自毛泽东的原话。

所以，到了7月26日北大召开群众大会的场合，李雪峰和北京市委与中央文革的立场并无二致，虽然李雪峰不像江青那样锋芒毕露，而且由于工作组是北京市委直接派的，有承担责任的意思，但是他绝对不会和中央文革“对着干”。

再者，政治家之间的事情，不是姑嫂勃谿、帮派斗殴，没普通老百姓想象那么简单。就因为仕途凶险，一般均出言谨慎，留有充分余地，不会摆出一种剑拔弩张的样子。典型如1965年12月，彭真在上海见到张春桥，张春桥把他们批判《海瑞罢官》的计划给彭真看，并将他们联系的北京“左派”戚本禹、关锋介绍给彭真知道。彭真则说等批判完了请张春桥吃烤鸭。此时他们双方都在互相摸底，毛泽东也在观察和考验彭真。政治形势云谲波诡，谁也看不透下一步的走向，都给对方留足面子，也给自己留有足够的回旋空间。所以，从政治家一般行为准则来说，李雪峰“奉陪到底”的话相当不可信。

作为历史资料，李雪峰的文革回忆录非常可贵，保留了一些重要原始资料。他在写这些回忆时的心态也算平和，但在涉及自身时难免有掩饰之处，按照现在的说法可称为记忆美容。而以《党史博览》为代表的当下舆论仍然偏爱那些编造出来的童话而罔顾事实。而这些编造出来的东西往往既迎合又引导了一般大众对历史的理解。

那么，是李雪峰在伪造历史了？

那也未必。在李雪峰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一些细节，是很珍贵的历史材料，但是在日期记忆上有一些错讹。例如他所叙述的7月18日的怀仁堂会议，收入此文该书编者根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记载，在附注中指出上面所说的会议应是7月19日召开的。因为他叙述有江青参加，我估计应是22日会议。李雪峰在写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内容有些错乱也是难免的。

当然在我所说的北大讲话罗生门中，两者相差太多，难于统一。我想可能的原因一是整理者凭想象所为。二是记忆的选择性所致。

前年在《炎黄论坛》看到一篇好文章《不应忘却的记忆》，可惜找不到作者名字。这位作者在1970年支左，在一处农村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打三

反”运动。根据回忆，他作为驻军代表还是很讲政策的。“因为我带头严格执行政策，所以在公社办的学习班里从未发生过辱骂或体罚学员的事件。在研究对学员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时候，总是按照毛主席‘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教导，尽可能地从政治和生活方面给他们以生存下去的希望和空间。”

可是，当他翻看当年的日记时，他感到震惊了，由此勾引出记忆的片段，“在试图把他们连接起来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比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无法言表的痛苦。”

例如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的内容：“昨晚又有一个小子自杀！是赵庄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算上前几日死的蒋××，全社死了十余人了……反动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手段之一，就是用自杀来威胁我们。可是这是枉然的。我们一方面要怒斥他们（的）反动行为，一方面却也应注意政策，防止他们自杀，以得到更大的战果。”

他说：“人有一种避恶趋善的本能，在提取储存在大脑里的记忆时，往往本能地跳过那些不愿意提取的不美好的记忆，而侧重提取美好或至少是不丑恶的记忆，因为终日被不美好甚至是丑恶的记忆缠绕的人是无法继续生存或无法继续正常生存的。”

这往往是罗生门的产生根源。声称打捞过老舍尸体的有四个人，而声称殴打老舍的人一个也没有。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中，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记忆不同，也可从这个角度理解。

张承先当年7月中旬在北京市委压力下步步后退，但是总也跟不上，终于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受尽污辱，还遭到彭小蒙的殴打，沦落到北大党委一样的地位。吴德十几天前的话一语成谶。我看过张承先写的回忆录，态度还很诚恳，但是对于他在领导北大工作组一段工作的描述，还很难做到客观的态度。例如他在进驻北大以后说的“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未必能记忆。

邓拓是文革首批殉难者，自称“书生”，但是他在1965年有关北大“四清”的国际饭店会议上也是凶相毕露，说要“刺刀见红”。

在这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绞肉机里，相互倾轧是自保之道。谁也没有例外。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有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

这是一场灵魂的洗礼，如那位前支左人员的思想经历。能到达这一境界，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本文由发表于2012年8月10日的《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和9月

【史实考订】

叶剑英冲谁拍桌子？

杜钧福

文革中称为“二月逆流”，文革后称为“二月抗争”的事件，由“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等组成。在“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中，为人所称道的逸事，莫过于叶剑英拍桌子，甚至于拍裂了掌骨。有人认真考证拍裂的是左手还是右手。至于是冲着谁拍桌子，大家都说是冲着江青、中央文革。例如，曾涛的《正义的抗争——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就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宜粗不宜细”这个原则闹的，都凭印象做出判断，想当然。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历史研究必须从微观研究开始，绝对不能“宜粗不宜细”。

这就必须说说“大闹京西宾馆”是怎么回事。

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在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为一方，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为另一方，展开辩论。这时，叶群拿出一份发言稿要求发言。她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批判。然后江青等几人也持讲话稿发言批判萧华。可见是有预谋的。因军委并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徐向前也不知道江青、叶群她们这样做凭谁的旨意，只好在散会时宣布：今天会议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但是，散会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还是在军区传达了会议情况。于是一些群众组织就去抄了萧华的家。萧华四处逃避，最后到西山叶剑英家过了夜。徐向前了解了情况，电话里批评了杨勇。另一方面，周恩来听了叶剑英、聂荣臻等关于会议的汇报后，上报毛泽东。毛指示批斗萧华的大会不要开。

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徐向前又当面批评了杨勇。江青则追问萧华哪里去了？这时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天晚上跑到哪里去了，并且气得拍了桌子，把茶杯拍到地上。叶剑英也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掌骨拍裂了。这就是“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先说徐向前向谁拍桌子。

徐向前在文革中大概只拍了这一次桌子，发了这一次火，说明他实在是气极

了。他生气的对象有三：一是江青、叶群这帮人，搞萧华却不给他交底；二是杨勇，公然不听他的话，泄露机密，惹出了乱子；三是萧华本人不成器，到处躲藏。因为徐向前是全军文革组长，不能不顾江青这个顾问的面子，所以是站在比较中间的立场上的，拍桌子主要是对着萧华的，追问他躲到哪里去了。这当然冒犯了叶剑英。

所以叶剑英拍桌子是明确对着徐向前的。后来高文谦说是“两位老师对拍桌子”，与会者谁也不敢说话，有人偷偷溜了。（《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

还有一点，可能为所有研究者忽略。两位老师的对立不仅在萧华问题上。在前一日还有另一事件发生。

1966 年底，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被造反派连续批斗，身心交瘁，被叶剑英接至北京西山休养。1967 年 1 月 19 日，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打电话给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命令邱下山参加运动。邱回单位后即被拘禁和连续残酷批斗。因此，在 1 月 20 日的会上，叶剑英对徐向前拍桌子，几乎肯定还包括邱会作问题的成份。

当时徐向前的处境颇为尴尬，从这件事就注定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干不长。

（2011 年 4 月 8 日）

【史实考订】

谁镇压了 1976 年的“四五”运动？

杜钧福

2012 年第 6 期《炎黄春秋》上有马懋如先生撰写的《1976 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一文，是批评原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在同一杂志当年第 3 期上的文章《我经历的 1976 年天安门事件》的。吴忠的文章，由于他的经历和认识，自然有可商议之处。但是马先生自己的文章也有些问题，主要一点就是：谁镇压了天安门事件，或者说，谁镇压了“四五”运动？

马先生的文章说，这一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打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吴忠将军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包围天安门调兵的当事人，是‘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被迫上阵）。 ”

那么，是“四人帮”迫使吴忠“上阵”的吗？大家知道，“四人帮”里官最大的是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据说，1974 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毛

泽东让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了，可是没一个司令站起来。点名都没人理，能听他们的话镇压群众吗？

况且，事实经过如何，只能凭当事人回忆。根据吴忠的叙述，所有指令均来自中央。作为中共党员、中共领导的军队的将军，听从指挥是很自然的，无所谓“被迫”。不管是否“被迫上阵”，“‘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这顶帽子，不但吴忠将军不能承认，广大读者亦不认可。

根据吴忠文章披露，在“四五”事件以前一段时期，他所得到的指令有这样几件：

周恩来逝世后，“……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但吴忠又说，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似乎是指毛泽东未参加周的遗体告别事。“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

4月1日群众开始往天安门送花圈。“这时吴德、倪志福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说不要搞这个。”吴德“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说中央的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样大。”但是花圈还是越来越多。

4月4日，广场上有人讲演，公开骂江青。鲁瑛汇报上去，江青发飚，吴德给吴忠打电话，叫抓那两个人。“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本来政治局决定6日收花圈，但是5日凌晨改为立刻收。吴忠说是张春桥建议的，但是“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

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军队。这时主持军委的陈锡联召集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和司令员吴忠到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的还有秦基伟、梁必业。此时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陈锡联谈到外地一些情况，又谈到部队调动由军委下命令，调到北京的部队由吴忠、卫戍区指挥。所以，“四五”事件的关键环节：调动军队，完全按规程进行：政治局——中央军委——卫戍区，不能说是“四人帮”在调动。

到了5日，事情越闹越大。警卫一师、二师不顶用了，又请示陈锡联，调警卫三师、四师五六千人进城。

事情继续发展，有一些人砸汽车，烧警卫部队的小红楼。“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

以上吴忠讲的是否全为事实？不敢打包票。特别是他未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的事如政治局会议上谁的发言，就未必准确。他也可能有文过饰非的地方，也可看出他尽量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但无论如何，他所叙述的主要举措是政治局通过的这一点，恐怕无可怀疑。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上级（军委）的命令是他的天职。他所做的结论：“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无法推翻，除非有更过硬的材料。

另一当事人吴德的回忆可以作为参照（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吴德说，关于不在单位设灵堂的通知是“四人帮”“指使”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的。他可能说的对，因为当时几乎无人理睬这个通知。

但是吴德又说，当时“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这实际上激化了矛盾。

4月4日，政治局在人大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好像没参加，毛远新列席，主要由吴德汇报情况。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当然主要是根据他的汇报作出的（和13年以后的事有些类似），所以吴德本人应对“四五”事件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对此，他的回忆录中没有完全回避。

这其中，发生广场上有人骂江青和抓人的插曲。到了4日晚12时，江青建议结束天安门悼念活动，收花圈。作为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华国锋拍板作了决定。

4月5日下午，政治局会议在人大大会堂开会。会议进行期间毛远新拿了毛泽东一个条子进来说，毛主席指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于是决定出动民兵，由吴德作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广播讲话稿，决定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吴德的回忆与吴忠的文章大体符合。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四人帮”，当然包括“四人帮”在内。马懋如的文章说是“四人帮”镇压的，却没有给出任何根据。相对来说，吴忠的文章更忠于史实。

马懋如承认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但是他说“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经毛主席圈阅。”在这里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说明这一决定是在江青等人左右下做出的。

马懋如批评吴忠的文章，说事情的起因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而吴忠说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问题。吴忠说的是诱因，可以商量，但不完全错，因为包含“四人帮”的作用在内。

马懋如指责吴忠文章将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说成是少数人闹事，胡闹。实际上，吴忠指的是砸汽车、烧楼房那些人。他说是“一伙小流氓”，自然不对，应

说是愤怒的群众，但这样的行为似也不值得提倡。

至于吴忠的文章未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整体判断，也是他个人思想的局限所致，不能过高要求。他能如实叙述事情的经过，就算对历史有个交代了。我想他基本上做到了这点。

下面再进一步对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的性质和在当代历史上的地位做些讨论。这个问题有许多学者讨论过，但是看了马懋如的文章后，我还想说两句。

如上述吴忠、吴德回忆所披露的天安门事件细节，镇压决定是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主要责任者按次序排一为毛泽东，二为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华国锋，三为汇报现场情况的吴德。“四人帮”肯定起了很强的煽动作用，但不能单纯说是“四人帮”镇压了这个运动。

另一方面，从参与群众来说，所反对的也不单纯是“四人帮”。在讲演和挽联诗词中明确反对“四人帮”的是极少数，更少数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正如吴德在汇报中所讲的，有 48 起是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而冲突的焦点是官方不允许老百姓到天安门去，而老百姓偏偏要到天安门去。几乎所有老百姓和官方较的就是这个劲。所以当时和后来官方通过各单位追查的，是你是不是到天安门去了，而不管你是否发表什么言论。

就此而言，老百姓所反对的，就不仅是“四人帮”了，也包括北京市委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发布的不许到天安门去的禁令。而不管是北京市委独立做出的，还是在“四人帮”“指使”下发布的这一类禁令的初衷，实质上是不允许老百姓参加任何非官方组织的活动，不能惯老百姓这个毛病。今天你允许他们冠冕堂皇地到天安门悼念总理，事实上给了他们独立组织集会的权利和先例，明天他们说说不定就会利用这个权利干什么。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包括笔者在内，所表达的是怀念周恩来的情思，所争取的是悼念周恩来的权利，更一般地说，是随便到天安门广场上干自己所愿意干的事情的权利。

这就是理解“四五”运动实质的症结所在。“四五”运动意味着广大人民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初步摆脱了毛泽东文革理论框架的思想控制，独立自主开展争取最低公民权益斗争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十年了，老百姓什么也没得到，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什么巴黎公社原则之类的许诺一条也没兑现，官员们离人民公仆这个形象越来越远。他们心底的怨恨达到了极点，对报纸上任何虚假的宣传都不相信甚至反感。现在，连天安门这个地方都不许去，还谈得到什么人民的权利？

百万群众由纯粹政治原因聚集到天安门广场。27 年来，在这个广场上召开了无数次群众大会，然而，这是第一次群众自发聚集的聚会。10 年前，毛泽东

君临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呼百应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百万人民以自己的集体无意识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题目，选择了最大公约数的目标，演出了这一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活剧，在专制体制最薄弱的地方打开了缺口。所说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只是一种外在的包装。当时当政的人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四人帮”覆灭以后长期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2012 年 7 月 30 日）